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新冠肺炎疫情下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與陰謀論

Taiwan's Ethnic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Conspiracy

Theory under Covid-19 Pandemic

須予謙

YU-CHIEN Hsu

指導教授：童涵浦 博士

Advisor: Hans H. Tung,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January , 2023

# 謝辭



從大學到碩士，一路有太多貴人相助，僅希望透過謝辭表達我的感激。

謝謝童老師兩年多來的細心指導，從題目發想、寫作、到各層次的修改方向，老師都會直接明白地點出問題所在，耐心地與我解釋統計模型、語句邏輯的潛在錯誤。謝謝老師給予我充足的信心和勇氣完成學業，希望自己不負所托，能像老師期許的那樣不畏困難、持續前進。

而無論是大綱口試還是論文口考，學生也要感謝俞老師和吳老師的專業用心的評論，這些都讓學生得到更多啟發，也讓本文更精進完善。

學生自碩一投身公共事務，因此論文撰寫的過程一直是半工半讀。三年來歷經 2020 總統大選、四大公投、2022 九合一大選，謝謝每一位工作夥伴和長官的陪伴與支持。謝謝朱主席、頭哥、強哥、孫執行長信任我，給予我充分的時間和彈性完成論文。謝謝葳姐、濤哥、誌慶哥、家興學長、大成哥、祐哥、仔仔、羽婷姐、斗哥、容玲姐、學青姐、羿奴在工作上的提點和照顧，未來我一定會更努力，以更好的表現回報大家的疼惜。

寫作過程中，同學們之間的砥礪和腦力激盪更是不可或缺，碩一在 615 有涵雯和 Amy 一起修課，碩二在 613 是奕鈞學長、良亦和易修拉了我一把，在升碩三的暑假激勵我通過論文大綱口試。碩三在 612 則是有 Benjamin 和宇哥的陪伴和指點，讓我逐一完成迴歸分析和結論的同時，能撐住工作上逐漸增加的壓力。

我要特別感謝思宇，因為有他風趣幽默的段子、因為有他富含人性關懷的觀點、因為每次碰到困難他都會全心全意與我共度難關，我實難想像沒有這位兄弟我如何完成碩論。正如至桓、賀煦、騰億、冠瑜、笑語、茂芊夫婦之於我課外的支持，思宇就是碩士階段最重要的朋友，未來若思宇選擇離開台灣打拚，我會時刻想念他。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父母和妹妹，謝謝家人們的鞭策和提醒，讓我沒有在半工半讀的疲憊中迷失方向，讓我在更明白家庭、承諾、責任的重要性後，以最好的狀態完成碩士學位。謝謝我最親愛的父母和妹妹，有你們真好。

予謙 2023/02/07 社科院 623 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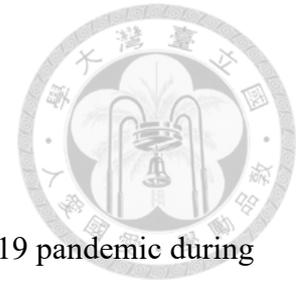
# 摘要



當 2020 上半年全球深陷「新型冠狀病毒」(COVID 19) 疫情，我國在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努力下應對相對得宜。而儘管防疫表現備受肯定，但是國內言論市場仍充斥在國外研究脈絡中源於國家防疫不利的「新冠肺炎陰謀論」(COVID conspiracy theory)。故本文採用量化方法檢視 2020 年 5 月在我國進行的線上問卷，欲探討在截然不同的疫情嚴重程度下我國民眾仍相信新冠肺炎陰謀論的原因。本文發現，族群集體自戀和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有明顯的關聯，且台灣人認同以及新冠肺炎風險認知兩變項能有效說明族群集體自戀者的族群正面形象威脅來源，而台灣人認同則對族群集體自戀有明顯的調節作用。綜合以上，本文也針對相關研究發現給予未來研究進一步的延伸方向。

**關鍵字：**政治心理學、認同政治、集體自戀、新冠肺炎、陰謀論

# Abstract



Whe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ere suffering from COVID 19 pandemic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2020,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ivil society had worked together to maintain a relatively normal pace of life. Although Taiwan's coronavirus response was highly-regarded, Taiwan's marketplace of ideas was still plagued by conspiracy theory which had been attributed to ill governmental response on the pandemic by foreign study. By using quantitative method to analyze an online survey collected during May 2020 in Taiwan, this study tries to figure out the reason why the Taiwanese public believed in COVID conspiracy theory under completely different pandemic severity. This study finds out that ethnic collective narcissism is highly associated with COVID conspiratorial belief. In the meantime, Taiwanese ethnic identity and COVID risk perception could manifest the image threat perception for those ethnical narcissists, while the Taiwanese ethnic identity has obvious moderation effect on the ethnic collective narcissism. To sum up, this study offers recommendation for future studies on relative issues.

Keywords: Political Psychology, Identity Politics, Collective Narcissism, COVID 19, Conspiracy Theory

# 目次



謝辭.....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圖次.....	vi
表次.....	vii
壹、緒論.....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背景.....	3
三、研究問題.....	5
貳、文獻回顧.....	7
一、陰謀論信念的政治、社會、心理因素.....	7
二、社會動機與集體自戀.....	12
參、理論假設與研究設計.....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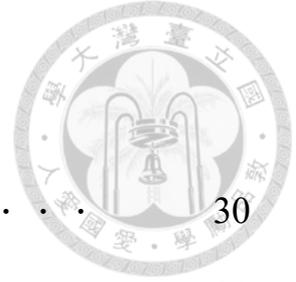
一、理論建構與假設 .....	18
二、研究範圍與設計 .....	20
三、資料來源與變項操作化 .....	22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	27
一、敘述性統計 .....	27
二、迴歸分析 .....	35
伍、結論 .....	48
(一) 研究發現 .....	48
(二)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	49
陸、參考資料 .....	51
一、中文部分 .....	51
二、英文部分 .....	53
附錄一、四陰謀論完整迴歸分析表 .....	63
附錄二、交互作用項完整迴歸分析表 .....	64
附錄三、問卷題目一覽表 .....	65

# 圖次



1.	產生陰謀論信念的各式因素 . . . . .	7
2.	本文研究架構圖 . . . . .	21
3.	本文研究變項架構圖 . . . . .	22
4.	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敘述性統計長條圖 . . . . .	28
5.	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轉移焦點／否定現實比較 . . . . .	29
6.	族群集體自戀／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標準差比較 . . . . .	31
7.	集體自戀相關研究架構圖 . . . . .	38
8.	交互作用項對生化武器陰謀論信念的估計圖 . . . . .	46
9.	交互作用項對威權政府陰謀論信念的估計圖 . . . . .	46
10.	交互作用項對圖利騙局陰謀論信念的估計圖 . . . . .	47
11.	交互作用項對經濟崩潰陰謀論信念的估計圖 . . . . .	47

# 表次



1.	族群集體自戀的敘述性統計量 . . . . .	30
2.	台灣人認同的敘述性統計量 . . . . .	32
3.	控制變項的敘述性統計量 . . . . .	33
4.	迴歸分析結果表 . . . . .	36
5.	四陰謀論信念的樣本平均值 . . . . .	40
6.	交互作用項迴歸分析結果表 . . . . .	43

# 壹、緒論



## 一、研究動機

2020 上半年，當全球深陷新冠肺炎疫情時，我國因政府因妥善準備防疫物資、嚴格控管邊境、隔離檢疫完善（中央社，2020），加上國民勤於落實衛生保健和配戴口罩，全國上下得以在 6 月 7 日完全解封，民眾恢復正常生活（中央社，2020a）。我國政府的防疫表現因此廣獲國際媒體（中央社，2020c）和多國公衛專家的正面肯定（衛生福利部，2020）。

我國由於特殊歷史背景長年受國際社會排擠，因此在國內疫情穩定的前提下，政府遂計畫以對外援助防疫物資尋求外交突破。外交部自 2020 年 4 月啟動「Taiwan Can Help」專案，對美歐、東南亞、非洲等 80 多個國家輸出近 5 千萬片口罩（外交部，2020），民間也主動發起全民募資，透過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刊登「Taiwan Can Help」廣告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中央社，2020d）。從民調結果來看，臺灣民眾在 2020 上半年應是對國家和政府充滿自信和感到驕傲的，我國總統和內閣的滿意度、信任度雙雙在 5 月中前創下蔡英文與蘇貞昌內閣的任內新高（TVBS 民意調查中心，2020a, 2020b, 2020c）。然而就在國內整體氛圍積極正面，臺灣的國際能見度也有顯著提升時，政府和民眾卻在眾多與新冠肺炎有關的涉外議題中，表現出讓人意外、極為負面的對外政治態度。

首先，儘管「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呼籲各國避免使用「汙名化」的疾病命名，甚至國外已傳出不少因汙名化而起的亞裔仇恨犯罪（劉紹華，2020），時任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卻仍堅稱「使用『武漢肺炎』有利辨識、不涉評價」（中央社，2021）。其次，雖然蔡英文總統公開否認 WHO 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 2020 年 4 月針對國內網路社群的種族歧視控訴，王銘宏（2020）針對 PTT 的文字探勘分析，卻發現 PTT 在該年

1 到 3 月，確實有千分之五的貼文回應以歧視性非裔的字眼如「黑鬼」或「尼哥」稱呼譚德塞。

最後也是本文所關注的，是我國與世界各國相比非常獨特，即使疫情相對緩和，爭議性極高的新冠肺炎陰謀論卻十分盛行。以 2020 上半年的臺灣來看，中央社和民間四大報社皆曾刊載新冠病毒為「武漢病毒實驗室專家製造的生化武器」（中央社，2020f；中時新聞網，2020；聯合新聞網，2020；自由時報電子報，2020；蘋果新聞網，2020），顯示新冠肺炎陰謀論在國內言論市場頗受民眾青睞。針對此現象，童涵浦（2020）的網路專論文章指出理性自利的政治因素和臺灣民眾的陰謀論信念有關，因為政治立場本土的民眾相比光譜的另一端，對臺灣受國際社會排擠的孤立感和對中國威權化的疑慮皆更高，所以他們更傾向相信在中國大陸爆發的新冠肺炎是生化武器、是威權政府的陰謀、是騙局、是隱瞞經濟崩潰的陰謀論，藉此充實「批判北京政府的重要論述資源」。

政治因素的解釋固然直觀有力，但是當我們檢視國內有關政治態度、特別是涉及兩岸關係的相關研究都指出除了理性自利之外，感性層面的「心理因素」不可忽略。本文感興趣的即是從心理因素出發，臺灣民眾究竟是出於何種心理動機，在疫情已然受到控制且國際形象，甚至在部分人眼中國際地位也顯有提升的狀況下，仍選擇以負面、偏頗、缺乏證據的陰謀論詮釋新冠病毒的源起、對新冠肺炎抱持「陰謀論信念」（Conspiratorial Belief，可理解為相信陰謀論的程度），本文將在後續章節說明。

## 二、研究背景



經研究者詳查，我國學界迄今尚未開展與陰謀論相關的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因此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之窗。

新冠肺炎迅猛的疫情加上疫情初期資訊的不透明，讓眾多質疑新冠病毒源頭的新冠肺炎陰謀論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Ellis, 2020），如 2020 年 3 月在美國的一項調查，顯示將近 31% 的民眾相信新冠肺炎是刻意被創造和散播的，且另外有 29% 的人認為新冠肺炎的威脅被刻意誇大（Uscinski et al., 2020）。不少實證研究指出新冠肺炎陰謀論對社會造成明顯的負面影響（Enders et al., 2020），輕信新冠肺炎陰謀論因此認為疫情是「騙局」或「被誇大」的民眾，容易因為低估新冠肺炎的嚴重程度而拒絕戴口罩、不願維持社交距離、甚至堅決不施打疫苗（Biddlestone et al., 2020; Freeman et al., 2020），所以有學者專家視陰謀論、假新聞、以及假訊息為有落實防疫政策和進行科學溝通的最重要挑戰（Bavel et al., 2020）。由此可見，理解人們為什麼會取信於表面看似荒謬且缺乏證據的陰謀有重要的公共事務實務價值，能指引出一條落實防疫措施、保護公眾免於新冠肺炎威脅的明路。

Douglas et al. (2019) 回顧陰謀論信念的相關研究並整理出人們相信陰謀論的三大因素：政治、社會、以及心理因素。童涵浦（2020）對我國民眾為何持有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初步分析即顯示，臺灣民眾的陰謀論信念可能出自於理性自利的「反中」因素，此明顯屬於政治因素。

然而，誠如眾多國內學界有關國人政治態度，特別是涉及兩岸經貿交流態度（吳乃德, 2005; 耿曙 et al., 2009; 陳映男 et al., 2015; 陳陸輝, 耿曙, 涂萍蘭, et al., 2009; 陳陸輝, 耿曙, & 王德育, 2009）和中國大陸印象（吳重禮 et al., 2016; 關弘昌, 2018）的研究顯示，影響國人政治態度的除了理性的政經因素外，國家（國族）認同、族群認同等感性心理因素也有其影響力。故本文從國內學界既有的「感性 VS 理性」研究脈絡再出發，探討是否存在除了身份認同外，能更精確

描繪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國人「高度對內滿意、高度對外敵視」心理狀態的心理學概念，並運用合適的統計模型探討此心理學概念與陰謀論信念在我國獨特的國際情勢、防疫條件下，是否仍有相關。

下一個章節，本文會詳細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與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

### 三、研究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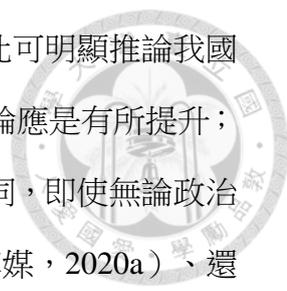


如「研究動機」和「研究背景」兩章節所述，2020 上半年的我國為國際公認的防疫資優生，不少民眾因此對國家和政府充滿自信且感到驕傲，本文因此選擇內涵接近、由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提出的心理學概念「集體自戀」(Collective Narcissism) 作為解釋臺灣民眾抱持陰謀論信念的主要心理因素。

集體自戀是個人對所屬群體投注 (investing) 大量情緒的「群體認同」(Group Identification)，是「一種未被外界充分認可，但個人認定所屬群體崇高偉大，且應該獲得特殊待遇的信念」(Cichocka et al., 2018; Golec de Zavala, 2018;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 Guerra et al., 2020)，然而個人內在隱藏對群體的不自信讓「集體自戀者對所屬群體的自我膨脹信念亟需外界認可，且當此膨脹的形象認知受到威脅時，對形象威脅極度敏感的集體自戀者會報以敵意與制裁」(Cichocka et al., 2016; Federico & Golec de Zavala, 2018; Sternisko et al., 2020; Golec de Zavala, 2011)。

本文透過「新冠肺炎的社會與道德心理學國際合作計畫」(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n the Social & Moral Psychology of COVID-19) 2020 年 5 月在臺灣蒐集的問卷資料，檢視新冠肺炎疫情下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傾向是否提升臺灣民眾的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相關研究顯示，英美兩國人民的「國家集體自戀」(National Collective Narcissism) 得有效預測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由於集體自戀者有「希望維持自身和群體的正面社會形象」的「社會動機」(Social Motive) (Douglas et al., 2017:540)，Hughes & Machan (2021) 和 Sternisko et al. (2020) 即發現英美兩國的國家集體自戀者在新冠肺炎威脅到國家正面社會形象的狀況下，會為了保護自身過度迷戀的國家形象，更加確信新冠肺炎陰謀論為真，以此轉移或降低認知中國家在嚴重的疫情中所應當承擔的責任。

顯而易見，更是本研究所關注、臺灣與英美兩國極為不同的地方，正在於我國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之初的社會客觀現實條件截然不同。首先，從前面兩章節爬梳之新聞資料、調查數據即可得知，我國 2020 上半年的防疫表現客觀上廣



受國外政府和媒體一致認可，主觀上也獲得國人高度讚賞，由此可明顯推論我國的國家形象顯然未如英美各國受新冠肺炎波及，甚至可合理推論應是有所提升；其次，臺灣民眾的國家、國族認同並非和英美兩國一樣高度趨同，即使無論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中央社，2020e）、臺灣民意基金會（風傳媒，2020a）、還是中央研究院社會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2020）的調查結果皆顯示「台灣人認同」的比例在 2020 年初達到歷史新高，但「雙重認同」或「中國人認同」都仍佔一定比例。換句話說，我國民眾的國家、國族認同並不完整，**臺灣民眾只有族群認同**。

本文因此嘗試探討：既然我國與英美在「前提預設」與主要「解釋變項」的概念上都所有所差異，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者是否會將新冠肺炎疫情視為族群形象的威脅，進而增加相信陰謀論的程度？理性政治因素與感性心理因素在陰謀論信念此政治態度上的拉扯，在納入族群集體自戀、台灣人認同、心理幸福感、個人控制感等更多理論上得提升陰謀論信念的心理因素後，前述段落提及的政治因素是否仍對陰謀論信念有解釋力？究竟是政治、社會、還是心理因素最能有效解釋臺灣民眾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選擇相信陰謀論的原因？本文將在後續章節提供符合本地脈絡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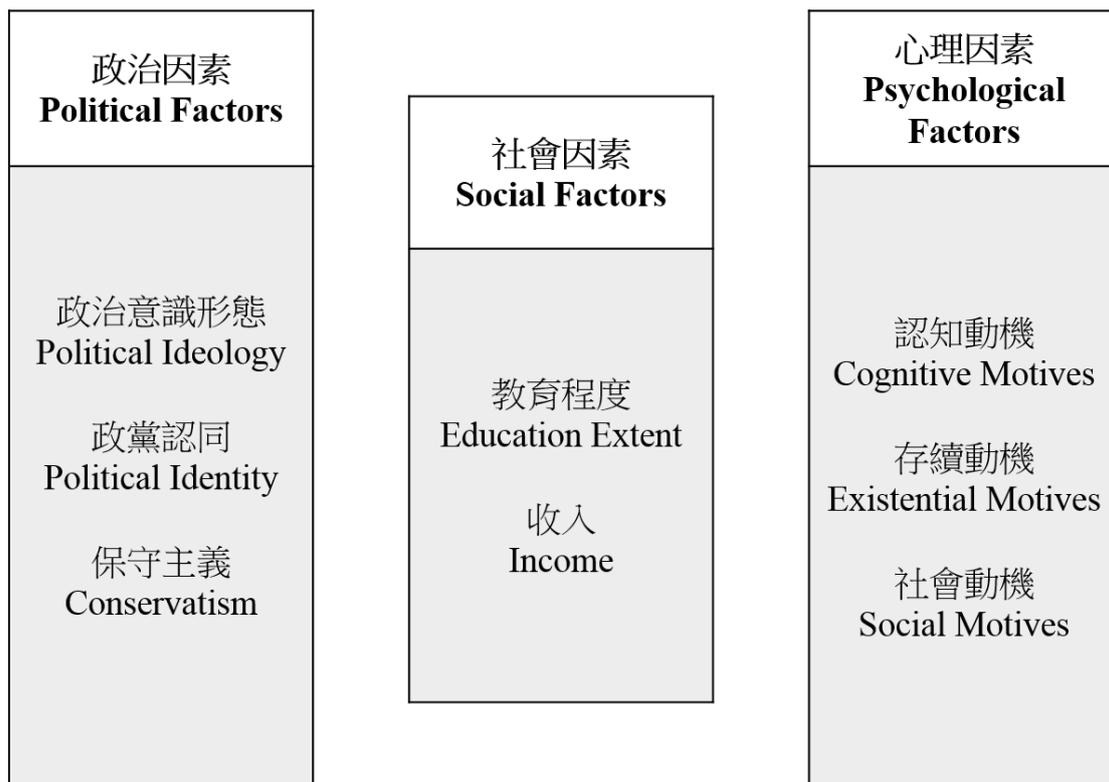
## 貳、文獻回顧



### 一、陰謀論信念的政治、社會、心理因素

「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 是個人或團體嘗試解釋某些重大政治、社會事件緣由的說法，人們聲稱這些重大事件是部分有權有勢、但心懷惡意的人或團體密謀策畫 (Byford, 2011; Keeley, 1999)。至於人們出於何種原因選擇抱持陰謀論信念，Douglas et al. (2019: 6) 歸納出三個因素，分別是：政治、社會、以及心理因素。有鑑於本文關注的主要自變項「集體自戀」屬於陰謀論信念心理因素的社會動機，故本文將社會動機獨立作為一個小節討論。

圖 1 產生陰謀論信念的各式因素



資料來源：Douglas, K. M. ... F. Deravi. 2019. "Understan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2019, 40(S1) 6-14，作者自行整理、翻譯。



## (一) 社會與政治因素

在各項社會因素中，人們的教育程度和收入多寡是過往研究關注的重點。Uscinski & Parent (2014: 102) 發現在美國隨著年收入和程度的上升，美國人對陰謀論的相信程度呈現明顯的下降。社會因素對陰謀論信念的影響並非只限於已開發國家，Hogg et al. (2017: 4-7) 在南非約翰尼斯堡最大的黑人城鎮「索威托」(Soweto) 進行的調查研究同樣觀察到無收入的失業者、學生，比有穩定收入的在職索威托人更相信愛滋病是科學家的發明、美國政府的陰謀、或是藥廠的商業詐騙。部分不滿社會因素表面解釋力的學者則主張高教育程度和高所得者多擁有較成熟、較複雜的訊息認知、責任歸因機制、以及媒體識讀能力，因此學歷較高、財力較雄厚的人自然較不相信看似荒謬、缺乏理性證據的陰謀論 (Craft et al., 2017; Douglas et al., 2016; Prooijen, 2017)。

儘管不少研究指出教育、收入等社會因素所決定的訊息認知能力和人們是否相信陰謀論有關，但可想而知的是當陰謀論涉及重要政治事件，其他非人口學變項的政治因素如政黨立場、意識形態更有可能是影響人們陰謀論信念的決定性因素。古語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研究顯示人們傾向認為不同政黨立場 (Claassen & Ensley, 2016)，和左右意識形態光譜另一端的個人或團體不安好心眼 (McClosky & Chong, 1985)，包括義大利、美國、荷蘭的實證研究皆發現左右意識形態光譜兩端的個人較容易相信陰謀論 (Mancosu et al., 2017; van Prooijen et al., 2015)。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意識形態左端的自由派，心理上較不開放、較不願意接納新訊息的保守派通常存有較高的陰謀論信念 (Baron & Jost, 2019; Galliford & Furnham, 2017; Jost et al., 2008)。

和社會因素的研究理路相似，學者們同樣不願接受對政治因素的探討停留在政黨立場和意識形態的黨同伐異。在前述基礎之上，Uscinski & Parent (2014) 認為陰謀論是政治競爭中輸家感知和調控源自當權者威脅認知的工具，因此我們時常見到陰謀論被當成輸家對贏家的控訴。部分學者則從理性自利的角度解釋陰謀

論信念的政治因素，由於人們在邏輯推演時有「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的傾向，所以個人既有的政治意識形態或政黨立場才會讓人在判斷、認知資訊時導向符合或有利於自己的陰謀論 (Duran et al., 2017; Galliford & Furnham, 2017; Saunders, 2017)，童涵浦 (2020) 發現意識形態本土、對中國大陸威權化保有疑慮的臺灣民眾視陰謀論為批判北京的論述資源的解釋亦可透過動機性推理理解。

## (二) 心理因素

從前述社會和政治因素的探討，吾人不難發現因為陰謀論信念為個人對特定政經社事件的態度，政治因素追根究底得從動機性推理、威脅認知理解，社會因素也必須運用認知過程、歸因機制等心理學概念深化，因此眾多政治和社會心理學家皆主張尋找陰謀論信念的心理學基礎最為直觀全面。奠基於人們有理性化、合理化現狀傾向的「系統合理化理論」(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Jost & Banaji, 1994; Jost & Hunyady, 2002; Jost et al., 2008)，Douglas et al. (2017) 指出人們可能基於以下三種心理因素選擇取信於陰謀論：「認知動機」(Epistemic Motives)、「存續動機」(Existential Motives)、「社會動機」(Social Motives)。

### 1. 認知動機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海德 (Fritz Heider) 在其著名的「人際關係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形容人的天性在理解外在結構因素時，會「不斷尋找穩定的、內在一致的特徵，藉以保持認知中的世界仍是可預測、可掌控的」(Heider, 1958: 139)，而此人類天性即構成了陰謀論信念心理因素的「認知動機」：當人們發現某事件客觀上缺少充分資訊、訊息互相衝突，或主觀上欠缺認知能力時，認知動機讓人們傾向訴諸看似言之成理、表面合乎邏輯的陰謀論，以保持外在環境仍在個人的理解和掌控範圍內 (Douglas et al., 2017)。

陰謀論信念的相關實證研究發現不少心理學概念可用於解釋認知動機的主

客觀假設。以促使人們依循認知動機理解特定事件的客觀條件來說：當某隨機性事件難用常識理解時，客觀上的資訊稀缺和互相矛盾讓人傾向屈就合乎「不實際的認知模式」(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 的陰謀論以拼湊事件全貌 (Dieguez et al., 2015; Prooijen et al., 2018; Whitson & Galinsky, 2008)；而當某些重大事件同樣因欠缺資訊導致合理解釋根本不存在時，「重大事件－重大結果推理模式」(Major Event-Major Cause Reasoning) 會促使個人將事件歸因於繪聲繪影的陰謀論 (Leman & Cinnirella, 2007; Leman & Cinnirella, 2013; McCauley & Jacques, 1979)。

即使外在事件客觀上皆缺乏明確說法，部分學者主張一些主觀上顯示個人認知能力不足的心理特質會讓陰謀論信念的認知動機有更高的機率出現。研究顯示當人們對理解事件因果關係能力過度自信進而產生高程度的「解釋深度的錯覺」(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 時，陰謀論對陷入錯覺的人們極具吸引力 (Vitriol & Marsh, 2018)；在政治因素段落約略提及，在現實生活中極度需要確定答案、好發於政治意識形態保守派群眾的高「認知閉合需求」(The Need of Cognitive Closure) 也會讓人更直接、快速、不加思索地接受陰謀論對特定事件的解釋 (Kruglanski & Webster, 1996; Patrick John Leman & Cinnirella, 2013; Marchlewska, Cichocka, & Kossowska, 2018)。

## 2. 存續動機

相較主客觀假設皆關注訊息誤判、事實落差的認知動機，「存續動機」更聚焦於人們維持正常生活的心理需求如「主體能動性」(Agency)、「控制感」(Personal Control) 和陰謀論信念的關係。Douglas et al., (2019, 2017) 指出，因為陰謀論多伴隨著衝擊市井小民生活的重大政經社事件而起，所以當人們缺乏主體能動性、對生活的控制感低落時，能塑造假想稻草人、情緒宣洩出口、或責任轉移的陰謀論遂有其獨特的吸引力。如 Pratt (2003) 延伸 Fenster (1999: 67) 對美國陰謀論者特質的闡述，主張在美國的陰謀論者多為社會不平等擴大下個人控制感低落、

心裡充滿無力感的個人。實證研究的結果也支持上述假設，Abalakina-Paap et al. (1999)的調查研究顯示對生活充滿無力感的大學生容易相信特定事件陰謀論為真，而 Prooijen & Acker (2015) 的調查研究則發現加強控制感能降低個人對陰謀論對象的威脅認知，進而有效減少人們的陰謀論信念。

以心理學經常使用的「狀態」(State)、「性格」(Personality) 二分法來看，上述提及的無力感低落屬於影響力短暫的狀態型心理特徵，未涵蓋性格層面的討論。細究擁有長期影響、且已經融入個人性格的心理特徵，學者們發現「特質性焦慮」(Trait Anxiety)、「死亡焦慮」(Death-Related Anxiety)、以及需要依附對象持續支持和關注的「焦慮型依附」(Anxious Attachment Style) 都會增加人們相信陰謀論的程度 (Green & Douglas, 2018; Grzesiak-Feldman, 2013; Newheiser et al., 2011)。這代表就陰謀論信念心理因素的存續動機推論，某些人對陰謀論的免疫能力可能因生活經歷本身或經驗塑造的性格在碰到特定事件時更容易受陰謀論吸引。

## 二、社會動機與集體自戀



相較認知動機與存續動機，「社會動機」的獨特之處在於其訴諸最直觀、醜陋的人性。Douglas et al. (2017) 強調受社會動機驅使的人們為了維持自我或所屬群體的正面評價和形象故選擇相信陰謀論，所以當陰謀論能把造成自己或群體的不利地位和負面遭遇轉移、卸責給其他團體或個人時，陰謀論自然對這些人吸引力甚高。

### (一) 社會動機與政治和社會因素的關聯

社會動機的解釋提供了研究者從其他途徑深化陰謀論信念的政治及社會因素，Douglas et al. (2019) 主張政治因素提到的「競爭中輸家較相信陰謀論」，和社會因素中低所得、低教育水平通常陰謀論信念程度較高，背後可能正反映著較低社會地位者為保持正面形象而尋找責任承擔者的社會動機。

社會動機的解釋在部分實證研究明顯優於收入和教育的社會因素解釋，如 Crocker et al. (1999) 的調查研究顯示無論社經地位高低，非裔美國人大學生相對白人大學生，更傾向相信美國政府對非裔的系統性種族歧視讓非裔美國人的愛滋感染率、中學輟學率、以及失業率等統計數據居高不下；Simmons & Parsons (2005) 更指出若個人曾親身經歷種族歧視，無論是學歷較高的政府官員還是一般大眾，非裔美國人都更傾向相信與美國政府有關的陰謀論，種族所隱含的社會動機對種族歧視相關的陰謀論的解釋力明顯比收入、教育、甚至政治意識形態都還高。

### (二) 個人自戀與集體自戀

同樣藉由狀態－性格框架檢視社會動機，前述與政治和社會因素對話的社會動機偏向狀態層面，並未涉及穩定、長期存在的性格特徵，Douglas et al. (2019)

認為符合社會動機的心理性格為「個人自戀」(Personal Narcissism)或「集體自戀」(Collective Narcissism)，兩者差異在於前者高度自滿於個體自我、後者則迷戀於特定群體中的社會自我 (A.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Hornsey, 2003)。

個人自戀相關的實證研究顯示，個人自戀程度偏高者因為擁有高度外在顯性自尊、低度內在隱性自尊，所以儘管自戀者表面看似自信非凡、但其內在的自我評價不穩定 (Jordan et al., 2003; Kernis, 2003; Zeigler-Hill, 2006)，故自戀者會為了保護脆弱的自尊而陷入「自利性偏差」(Self-Serving Bias) (Jennifer Crocker & Park, 2004; Emmons, 1987; Morf & Rhodewalt, 2001; Rhodewalt & Morf, 1995)，在面對破壞個人極度在乎的正面社會形象的特定事件時，選擇相信得卸責於外人或外在群體的陰謀論 (Cichocka et al., 2016)。

然而相較集體自戀，個人自戀對特定政經社事件陰謀論信念的解釋力明顯受到限制。有鑑於盛行於言論市場的陰謀論多與國內重要事件或具跨國影響力的國際大事，故除了少數特定政治菁英可能視特定事件為對自身形象的威脅，多數民眾應是將自我帶入群體才會義憤填膺地感受到群體形象受到損害。

從集體自戀實證研究中常用的兩階段概念即可看出集體自戀符合社會動機的定義：首先，作為「一種未被外界充分認可，但個人認定所屬群體崇高偉大，且應該獲得特殊待遇的信念」(Cichocka et al., 2018; Golec de Zavala, 2018;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 Guerra et al., 2020)，集體自戀的自戀人格讓集體自戀者對所屬群體擁有極度高漲的正面形象認知；其次，「集體自戀者對所屬群體自我膨脹信念亟需外界認可，且此膨脹形象受到威脅時，對威脅極度敏感的集體自戀者會報以敵意與制裁」(Cichocka et al., 2018; Golec de Zavala, 2018;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 Guerra et al., 2020)則表明對形象威脅極度敏感的集體自戀者傾向把群體正面形象的威脅歸咎於外界，咬定外群體或個人對我群圖謀不軌、從而對其產生敵意。

集體自戀得視為「個人自戀」(Individual Narcissism)對「社會自我」(Social Aspect of Self)的投射，相關研究 (Hornsey, 2003; Luhtanen & Crocker, 1992; Tajfel

& Turner, 2004) 指出「自我」(Self) 的概念包含「個人的自我」(Personal Self) 與奠基於群體認同的「集體自我」(Collective Self)，因此集體自戀者可能在期待外界承認自身的崇高與偉大時，一併要求外界尊崇個人所屬內群體的優越。與此同時，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1074) 主張集體自戀亦可被視為誇大、不穩定的「集體自尊」(Collective Self-Esteem, Hornsey, 2003; Luhtanen & Crocker, 1992)。「被威脅的自我理論」則提供實證研究檢驗集體自戀者在「群體互動」(inter-group) 層面，對外在群體產生的各式敵意態度和行為的理論基礎。美國心理學家佛洛姆 (Erich Fromm) 曾說：「當個人隸屬於全世界最優秀的群體時，儘管現實世界的他弱小如螻蟻，但群體的偉大讓他成為巨人」(轉引自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 p742)。由此可見，「被威脅的自我理論」亦可延伸自群體互動層面，當個人必須仰賴自我膨脹的群體形象補償低落的自尊時，感受到威脅的群體自我，自然可能引發個人對外在群體的敵意和報復回應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1975)。

觀察我國盛行的生化武器說合在歐美較流行的疫情騙局說，新冠肺炎陰謀論明顯是在疫情已對國家正面形象造成威脅後政府與公民用於轉移焦點或卸責的工具，故集體自戀相較個人自戀顯然應是相關研究關注的解釋變項，特別是國家集體自戀。

### (三) 國家集體自戀與陰謀論信念

相關實證研究顯示在不同的國家和社會脈絡中，國家集體自戀與陰謀論信念有明顯的關聯，符合社會動機的假設 (Cichocka, Marchlewska,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6; A. 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 2012; Hughes & Machan, 2021; Sternisko et al., 2020)。

在深入探討國家集體自戀與陰謀論的關係之前，從比陰謀論程度輕微的一般負面政治態度如「偏見」(Bias) 和「敵意」(Hostility) 吾人即可看出國家集體自戀者國家威脅來源極度敏感、針對性極強。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和 Lyons

et al. (2010) 的研究皆顯示國家集體自戀者只會對國家產生威脅的社會群體產生負面政治態度：前者發現波蘭的國家集體自戀和視猶太人為威脅的反猶主義有關，但跟波蘭人長期對英法兩國的負面觀感並無關聯；後者則發現美國國家集體自戀者僅對有強烈威脅認知的阿拉伯裔移民產生明顯的敵意，但威脅感相對較低的亞裔和拉丁裔則無。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 (2012) 研究指出波蘭國家集體自戀指向高度的「圍城心理」(Siege Mentality)，代表波蘭人的國家集體自戀程度越高、就敏感於外在勢力威脅凸顯的國家脆弱性，而圍城信念越高、波蘭集體自戀者的反猶主義越高漲。然而上述研究關注的是外群體對國家整體產生的威脅而非形象威脅，關注國家集體自戀與陰謀論信念的實證研究多將重點擺在符合社會動機的國家形象威脅。

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 (2012) 運用調查研究法發現波蘭人的國家集體自戀傾向越高就越相信猶太人正密謀稱霸全世界的「陰謀論式的猶太人刻板印象」(Conspiracy Jewish Stereotype)，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 (2012) 認為合理的解釋除了猶太人長期被視為「異類」帶來的威脅感外，另一個關鍵為不少波蘭人對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 歷史對波蘭國家形象正負面影響共存的矛盾心態。Cichocka et al. (2016) 則發現英國人的國家集體自戀讓英國民眾輕信外國政府對內群體心懷不軌的陰謀論，對內則不捨究責、不願相信本國政府正密謀傷害公眾利益，代表英國集體自戀者會為了捍衛國家正面社會形象選擇信任、容忍英國政府可能的負面作為。更貼近本文主題和背景，Sternisko et al. (2020) 和 Hughes & Machan (2021) 分析網路問卷發現英美兩國民眾的國家集體自戀傾向越高就越相信「否定現實」(Denial) 和「轉移焦點」(Deflect) 的兩種疫情陰謀論，英美國家集體自戀者把疫情當作是國家形象的威脅，所以更傾向以陰謀論為理想中的國家形象粉飾太平。Sternisko et al. (2020) 同時發現集體自戀者有更高的意願在社群平台上散布疫情陰謀論。

以 Leach et al. (2008) 對社會認同的分類來看，集體自戀和個人對所屬群體的正面感受極度強烈且群體身分對個人來說非常重要的「自我投注」(Self

Investment) 有關，集體自戀更特別彰顯自我投注面向中的「群體滿意度」(Group Satisfaction) 以及「群體自我中心」(Group Centrality) (Emmons, 1984;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9; Guerra et al., 2020)。由此可見，在國家集體自戀與陰謀論信念的相關研究中觀察概念相近的「內群體正面認知」(In-group Positivity) 如國家認同和個人對國家認同的自我投注有其必要。

Cichocka et al. (2016) 即以兩個調查研究和一個調查實驗，嘗試區分國家集體自戀與群體自尊、國家認同、以及自我投注和陰謀論信念的關聯。Cichocka et al. (2016) 發現非自戀式的「內群體正面認知」與陰謀論信念呈現顯著的負相關，代表人們若對所屬群體的非自戀群體正面認知越高就越不會被特定事件的陰謀論牽著鼻子走。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 (2012) 同樣發現波蘭國家認同越高的人，越不會有圍城信念、也越不相信猶太人正密謀征服世界，而國家認同在新冠疫情下也未導致更高的疫情陰謀論信念 (Hughes & Machan, 2021; Sternisko et al., 2020)。

綜上所述，實證研究顯示國家集體自戀確實為陰謀論信念心理因素的社會動機，國家集體自戀傾向高的民眾會為了捍衛受威脅的、自己過度熱愛的國家正面形象，更加相信隱射造成國家形象負面衝擊的事件為特定外界群體或個人的陰謀。反之，若人們對國家抱持的是非自戀式的內群體正面認知如國家認同，前述研究則顯示內群體正面認知並不符合社會動機的假設。申言之，人們對國家的心靈歸屬若不是高度自我投注、自我滿意、以及自我中心的，認同應不至於產生對外界負面政治態度。

#### (四) 小結

綜觀我國學界政治學、心理學等相關研究，迄今未有針對陰謀論、集體自戀、或兩者間關聯開展的研究。本為認為如欲於臺灣開展相關研究，在進入第三章「理論建構與研究設計」之前，必須釐清前述章節點出的重要問題：我國民眾國家認

同分裂對集體自戀概念建構的影響。

我國民眾國家認同分裂的事實，讓各派學者皆認同我國民眾的國家認同含有程度不一的原生性或建構面的「族群」(Ethnicity) 認同，故有「台灣人認同」和「中國人認同」之稱呼和分別，且不同學者對上述二分法的詮釋如「國族」、「民族」、「族群」，在不同年代或領域的研究問題中有指涉範圍和意思表達的差異。由於本文所欲探討的集體自戀現象在 2020 年 5 月的時空背景下，較能直接對應的是政府對外對內強調「Taiwan Can Help」的「台灣人認同」，所以儘管此時的「台灣」有解度為「國家」的空間，但本文判斷更普遍、更有共識的認知應該是在「族群」層次上，眾人共同對長年受中國大陸打壓、不被多數國家承認、但仍在疫情下積極援外的台灣感到驕傲的認同感，故本文依循張傳賢和黃紀（2011）欲強調群體與國家認同差異的「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 詮釋「台灣人認同」和相對應的「族群集體自戀」，而問卷中的問題設計也將台灣人認同稱為「族群認同」。

正因國內民眾族群認同的高低可能產生不同程度的族群正面形象認知和族群形象威脅感，將導致族群集體自戀的程度有所差距，且在後續影響到詭論陰謀信念社會動機的可能。依循過往研究以及前述客觀條件，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下被強化的對中敵意、對中威脅感，以及「Taiwan Can Help」的成功推動所強化的臺灣正面形象認知，本文合理推論台灣人認同較高相對較低者，其族群集體自戀程度應該較高也因此更容易升高對新冠肺炎的陰謀論信念。為了確認台灣人認同外的族群集體自戀是否在台灣人認同的影響下仍得預測陰謀論信念的強度，本文納入族群認同中的台灣人認同做為控制變項以便觀察族群集體自戀對陰謀論信念的解釋力是否充足。

在下一個章節中，本文將詳述理論建構與假設、研究範圍與設計、以及本文的資料來源與變項操作化。

# 參、理論假設與研究設計



本章嘗試提出理論回答本文的研究問題：臺灣人的族群集體自戀是否提升臺灣人相信新冠肺炎陰謀論的程度。首先，本章基於文獻回顧的結果，試圖建構新冠肺炎疫情下，符合臺灣獨有社會脈絡，即人民「高度滿意國家防疫表現」仍「相信疫情陰謀論」的研究假設；其次，本章會界定本文的研究範圍，以及得以檢驗此研究假設的研究設計；最後，本章將詳述計量模型中自變項、依變項、以及各控制變項的操作性解釋。

## 一、理論建構與假設

作為個體過分熱愛所屬群體的群體認同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集體自戀是個人對自我所屬的「群體正面形象」產生威脅的外在群體、個人、以及事物持有負面政治態度的心理基礎 (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 2012; Marchlewska et al., 2020; Zemojtel-Piotrowska et al., 2020)。相關研究皆指出 (Cichocka et al., 2016; 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 2012; Golec de Zavala & Federico, 2018; Hughes & Machan, 2021; Sternisko et al., 2020)，威脅到群體正面形象的陰謀論若能成為特定事件中個人為所屬群體「規避責任」或「轉移焦點」的工具，此時個人對特定陰謀論的陰謀論信念即會上升，Douglas et al. (2017, 2019) 進一步將集體自戀者傾向秉持陰謀論信念的心理基礎解釋為陰謀論信念的社會動機。

爬梳集體自戀與陰謀論信念的相關研究，本文所欲提出的理論涵蓋以下三項前提預設：

- (一) 集體自戀為個人對所屬群體過分熱愛的群體認同，因此個人對所屬群體擁有高度正面的形象認知
- (二) 集體自戀者對所屬群體的形象威脅極度敏感，所以集體自戀者容易對

無論是團體、個人、還是事物的形象威脅產生偏見

(三) 集體自戀者有亟欲維持所屬群體正面形象的社會動機，集體自戀者因而傾向相信能為群體減少形象威脅的陰謀論。

根據第一項前提預設，吾人得觀察到在 2020 年前半年的民調數據顯示臺灣民眾對國家和政府的防疫表現高度滿意（TVBS 民意調查中心，2020a, 2020b, 2020c），政府也積極宣傳我國的防疫表現和口罩外交「Taiwan Can Help」廣獲國際社會肯認（中央社，2020b；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2020；衛生福利部，2020a）。本文由此界定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族群集體自戀為上述主客觀條件下臺灣民眾對所屬族群產生的自戀式群體認同和族群高度正面形象認知。

根據後兩項前提預設，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者會對任何威脅到族群正面形象的團體、個人、事物極度敏感，包括阻撓我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的中國大陸政府（中央廣播電臺，2020；中央社，2020g）和國外疫情仍舊嚴峻的現實狀況下，有可能再度爆發、減損臺灣防疫光環的新冠肺炎。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者會將中國大陸政府的排擠行為視為否定國家防疫成就，新冠肺炎則是削弱、甚至粉碎國家正面形象的直接威脅，即使新冠肺炎疫情形塑了族群集體自戀者對臺灣的正面形象認知，但是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者仍可能對中國大陸政府和新冠肺炎本身產生偏見，所以亟欲維護臺灣正面形象的集體自戀者，就會依循陰謀論信念的社會動機對上述形象威脅訴諸陰謀論式的理解。因此當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感受到特定事物對族群或國家群體正面形象威脅，進而訴諸陰謀論信念的社會動機。

綜合上述理論推導我們得到以下理論假設：

若其他條件不變，當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程度越高，其對新冠肺炎陰謀論的相信程度越高。

以上為本文提出的理論假設以及推論過程。在下一個章節，本文將說明研究範圍和研究設計，以及本文檢證研究假設的研究方法。

## 二、研究範圍與設計



本文採用「新冠肺炎的社會與道德心理學國際合作計畫」(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n the Social & Moral Psychology of COVID-19, ICSMP) 於 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在臺灣蒐集的線上問卷資料,共蒐集 833 個樣本、問卷平均作答時間為 25 分鐘,問卷樣本的年齡、地區、以及性別符合臺灣本島民眾的分布。因此,本研究的时间範圍為 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研究對象為臺灣民眾。

我國本土新冠肺炎疫情至 2020 年 5 月中已然趨緩,衛生福利部(2021)數據顯示時至該年 5 月 20 日我國已經「連續 13 天無確診病例、38 天無本土確診病例」。本文提及可能促成臺灣民眾產生族群集體自戀的口罩外交「Taiwan Can Help」,以及臺灣民眾對政府的極高支持度的民調結果公布於本文問卷調查前,顯示形塑族群集體自戀的條件充足。

本研究的新冠肺炎陰謀論共有四項<sup>1</sup>,分別為:

- (一) 新冠肺炎是科學家所製造的生化武器
- (二) 新冠肺炎是意圖永久剝奪公民權利與建立威權政府的一項陰謀
- (三) 新冠肺炎是利益團體為了圖利而設的騙局
- (四) 新冠肺炎是為了掩蓋即將到來的全球經濟崩潰而創造的。

上述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的敘述皆符合陰謀論的定義(Byford, 2011; Keeley, 1999),四陰謀論皆嘗試「詮釋新冠肺炎起因和源頭」(Ellis, 2020)且都明指或暗指新冠肺炎是不安好心的個人和團體惡意策畫。前兩項陰謀論在本文研究時間範圍內實屬常見,作為訊息供給方的大眾媒體可能知悉作為需求方的多數臺灣民眾「不信任中國政府有能力有效控制疫情」(風傳媒, 2020c)且認為「中國因為隱瞞疫情所以要負起最大責任」(風傳媒, 2020b),故主流媒體所刊載的新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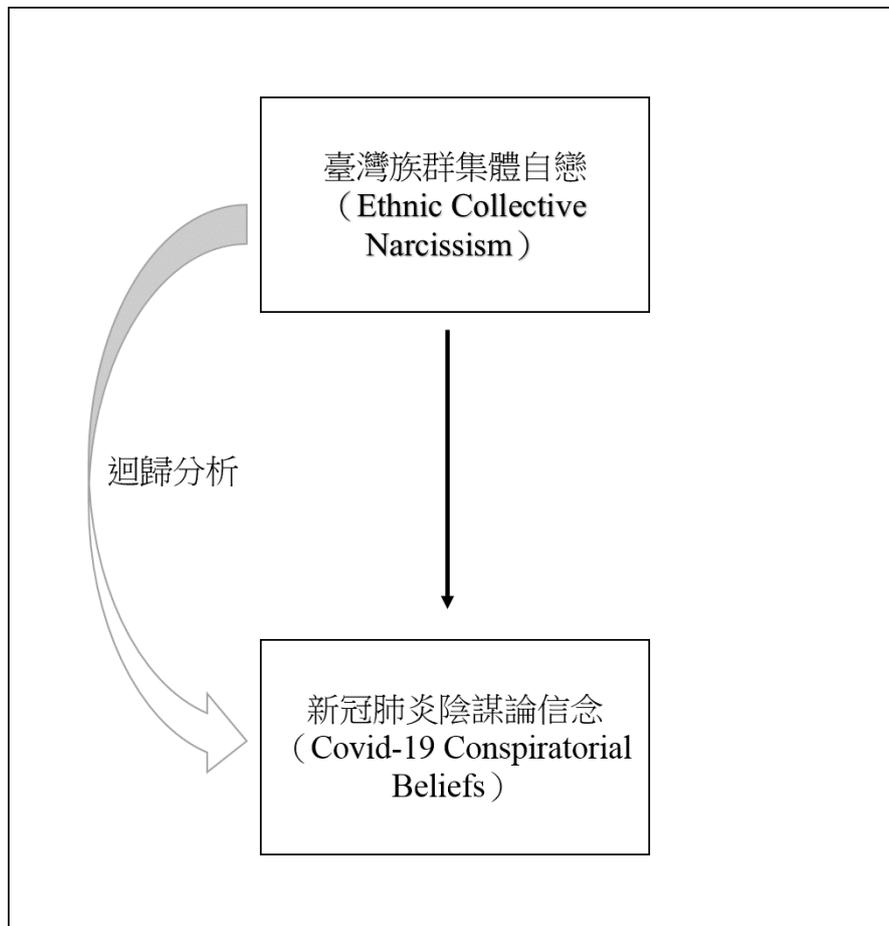
---

<sup>1</sup>為確保行文和閱讀順暢,本文在後續章節依序將第一至第四項陰謀論簡稱為「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圖利騙局」、以及「經濟崩潰」。

肺炎陰謀論多為「生化武器」陰謀論和「威權政府」陰謀論（中央社, 2020f; 中時新聞網, 2020; 聯合新聞網, 2020;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20; 蘋果新聞網, 2020），「圖利騙局」與「經濟崩潰」兩新冠肺炎陰謀論則多出現於疫情較嚴重的國家如英美與歐洲各國（Douglas, 2021; Imhoff & Lamberty, 2020），在我國言論市場則較少出現。

本文採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檢證族群集體自戀對四陰謀論的陰謀論信念的解釋力，檢驗本文解釋的變項操作化以及計量模型的設定，則會在下一章節詳細說明。

圖 2 本文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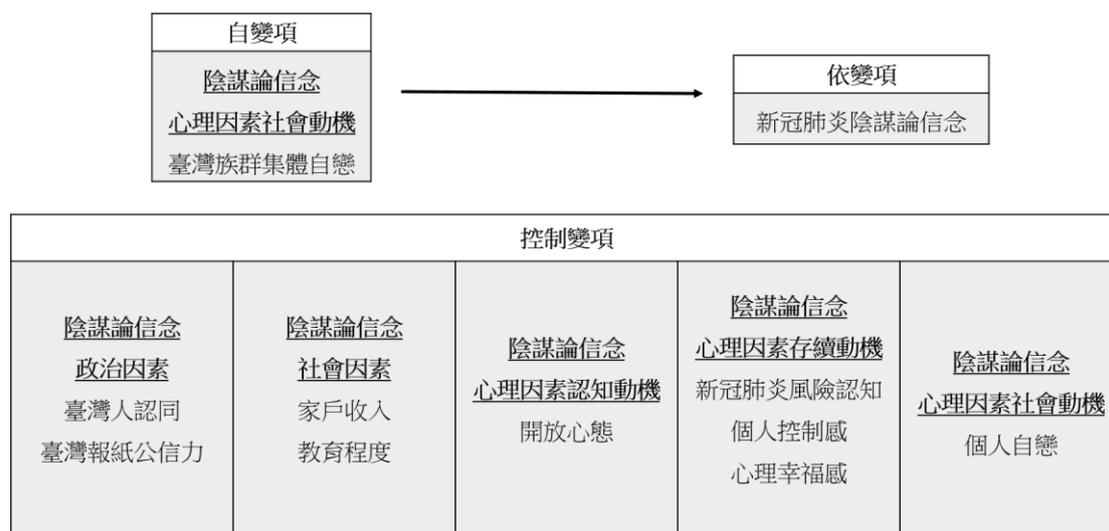


### 三、資料來源與變項操作化

本章節將說明檢證研究假設的變項如何操作化。根據本文的研究假設，研究中共有兩個主要變項：族群集體自戀，以及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族群集體自戀為研究假設的自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則是依變項。

在「新冠肺炎的社會與道德心理學國際合作計畫」的臺灣版線上問卷中，所有心理學概念和政治態度的測量，皆是採用學界主張更具互動性、得減少李克特量表所導致的調查疲勞而能獲得更符合測驗目的、更精確資料的「11 點滑梯量表」(11 Point Slider Scale) (Roster et al., 2015)。本文檢驗研究假設的各變項中，包括自變項族群集體自戀、依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控制變項台灣人認同、臺灣中文報紙公信力、「個人控制感」(Personal Control)、「開放心態」(Open-mindedness)、「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個人自戀」(Individual Narcissism)，皆是運用「11 點滑梯量表」(11 Point Slider Scale) 測量。

圖 3 本文研究變項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 (一) 自變項與依變項

在「新冠肺炎的社會與道德心理學國際合作計畫」於臺灣施行的線上調查問卷，族群集體自戀的測量採用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的「集體自戀量表」(Collective Narcissism Scale) 中的以下三道問題：

1. 我的族群值得享有特殊待遇
2. 並不是很多人完全理解我的族群的重要性
3. 在我的族群得到應得的肯認前，我永遠不會感到滿意

受測者必須依序回答對上述三道問題的同意程度。「克隆巴赫信度測驗」(Cronbach's alpha) 顯示三道問題皆為正向題目且樣本資料具 0.7470 的  $\alpha$  值，三測驗題目分別對應集體自戀「未被外界充分認可，但個人認定所屬群體崇高偉大，且應該獲得特殊待遇的信念」(Cichocka et al., 2018; Golec de Zavala, 2018;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20; Guerra et al., 2020) 的概念內涵，和集體自戀者「對所屬群體自我膨脹信念亟需外界認可」(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 的心理需求。第一題反映「所屬群體應該獲得特殊待遇的信念」，第二題測驗臺灣民眾是否主觀認為所屬族群「未被外界充分認可但個人認定所屬群體崇高偉大」，第三題則指向集體自戀者心目中所屬群體膨脹信念「亟需外界認可」的心理需求。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臺灣民眾對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的陰謀論信念，陰謀論內容即為前述提及國內常見的「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和流行於西方世界的「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說。受測者須依序回答對「生化武器」說、「威權政府」說、「圖利騙局」說、以及「經濟崩潰」說的同意程度。臺灣民眾對四項陰謀論的陰謀論信念和族群集體自戀皆由 11 點滑梯量表測量，屬於連續變項

## (二) 控制變項



除了上述兩個主要變項，本文為了完善研究假設的檢驗，控制文獻回顧中陰謀論信念除了集體自戀以外的政治、社會、以及心理因素。

首先論及政治因素的兩個控制變項：台灣人認同和臺灣中文報紙公信力。相關研究皆顯示，個人既有的政治立場容易讓人在判斷和認知資訊時，通過「動機性推理」導向符合有利於自身利益的陰謀論 (Claassen & Ensley, 2016; Duran et al., 2017; Galliford & Furnham, 2017; McClosky & Chong, 1985)。

以我國的情況來說，新冠肺炎加劇了臺灣民眾對疫情起源地中國大陸的不信任和敵意，而歷年研究皆指出台灣人認同者相對臺灣人與中國人雙重認同者 (Yang, 2016; 蒙志成, 2016; 關弘昌, 2018; 陳映男等, 2015; 陳陸輝等, 2009) 較容易對中國大陸產生敵意態度產生敵意。本文由此假設，臺灣民眾越同意「我是臺灣人」、「作為臺灣人反映了我之所以為我的一個重要部分」等兩道題目，以及認定立場偏綠的「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相對偏藍的「中國時報」與「聯合報」較具公信力者，會因為政治因素所導致的對中負面態度而更傾向透過陰謀論理解新冠肺炎的源起。資料性質上，台灣人認同為 11 點滑梯量表所測量的連續變項；臺灣中文報紙公信力則計為虛擬變項，認為某報紙有公信力即設為 1，認為該報紙無公信力或四大報皆否定者則計為 0。

其次論及社會因素。國外經驗指出，教育程度和收入多寡為解釋陰謀論信念的有力變項 (Hogg et al., 2017; Prooijen, 2017; Uscinski & Parent, 2014)，Prooijen (2017) 認為高教育程度和高所得者擁有更成熟和複雜的認知和歸因機制因此比較不會相信陰謀論對特定事件的解釋。本文據此將臺灣人的家戶收入與個人最高教育程度納入控制變項，兩者皆為類別變項。家戶收入從 0 元計算到 350 萬元並以每 50 萬元為一個級距，教育程度則從 0 標記到 2，分別為小學與國中、高中職五專、四技二專和大學以上。

本文於陰謀論信念的心理因素認知動機，控制「反映個人是否承認自身智識

與他人相比擁有侷限性，和不顧他人身分地位仍願意向其請教知識的態度與行為」(Alfano et al., 2017:6) 的「開放心態」(Open-Mindedness)。開放心態由 Alfano et al., (2017) 的「理性謙虛量表」(Intellectually Humility Scale)「開放心態子量表」(Open-Mindedness Subscale) 測量。過往研究顯示擁有理性謙虛性格特質的人必然擁有較高的開放心態，理性謙虛的人願意承認自身認知侷限性(Whitcomb et al., 2017)、對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較不敏感(Roberts & Wood, 2007)、傾向深思熟慮自己的想法(Samuels et al., 2015; Samuelsen & Church, 2015)，因此更願意在新事證出現的狀況下修正自己的想法(Hazlett, 2012)。本文由此推定，開放心態較低者會在新冠肺炎的源起仍眾說紛紜的狀況下傾向訴諸陰謀論信念的認知動機。開放心態同樣由 11 點滑梯量表測量，屬於連續變項。

本文在陰謀論信念的心理因素存續動機，控制心理幸福感、個人控制感、新冠肺炎風險認知等三個變項。存續動機說明個人相信陰謀論是為了補償正常生活中受到威脅的心理需求(Douglas et al., 2019, 2017)，而個人控制感和心理幸福感皆屬於人們生活中的重要心理需求，兩者的低落都會增加個人面對外在環境衝擊時的脆弱度，讓人傾向透過陰謀論降低特定事物對自身構成的威脅(Cichocka, 2020; Freeman et al., 2020; Prooijen & Acker, 2015)。上述推論亦顯示，個人對外在特定事物的風險認知是構成陰謀論存續動機的關鍵，因此本文將臺灣人主觀認知自己「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之前感染新冠肺炎的機率有多高」的「新冠肺炎風險認知」納入控制。本文的個人控制感由 Tangney et al. (2004) 研擬的「個人控制感量表」(Self-Control Scale) 測量，心理幸福感則詢問個人主觀的生活滿意程度，前述兩者心理概念皆為連續變項且 11 點滑梯量表測量，新冠肺炎風險認知則利用 0-100%的百分比量表。

最後，本文在陰謀論信念心理因素社會動機控制文獻回顧提及的「個人自戀」(Individual Narcissism)，並由 Leckelt et al. (2018) 研擬的「自戀傾慕和競爭短版問卷」(Narcissistic Admiration and Rivalry Questionnaire Short Scale) 測量，測量題目共六題：「我值得被當成有名望的人物看待」、「能夠鶴立雞群賦予我很大

的力量」、「我努力靠著我的卓越貢獻而得到眾人的矚目」、「我對被搶風頭感到惱怒」、「我希望我的對手失敗」、「多數人在某個意義上都是輸家」，從問卷題目即可直觀發現個人與集體自戀的差異即為情緒投注對象的不同，前者為個人對自身的傾慕程度、後者的對象則是所屬群體，個人自戀也是運用 11 點量表呈現的連續變項。

#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章節延續「理論假設與設計」章節並透過迴歸模型驗證本文假設。本文在第一小節會依據變項操作化所得之數據呈現各變項的敘述性統計，第二小節則透過迴歸分析表呈現迴歸模型中本文的研究假設解釋方向和研究發現。

## 一、敘述性統計

本節將聚焦討論研究假設中的自變項「族群集體自戀」與依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控制變項則以完整圖表呈現佐以簡略陳述。

### (一) 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

首先觀察依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樣本數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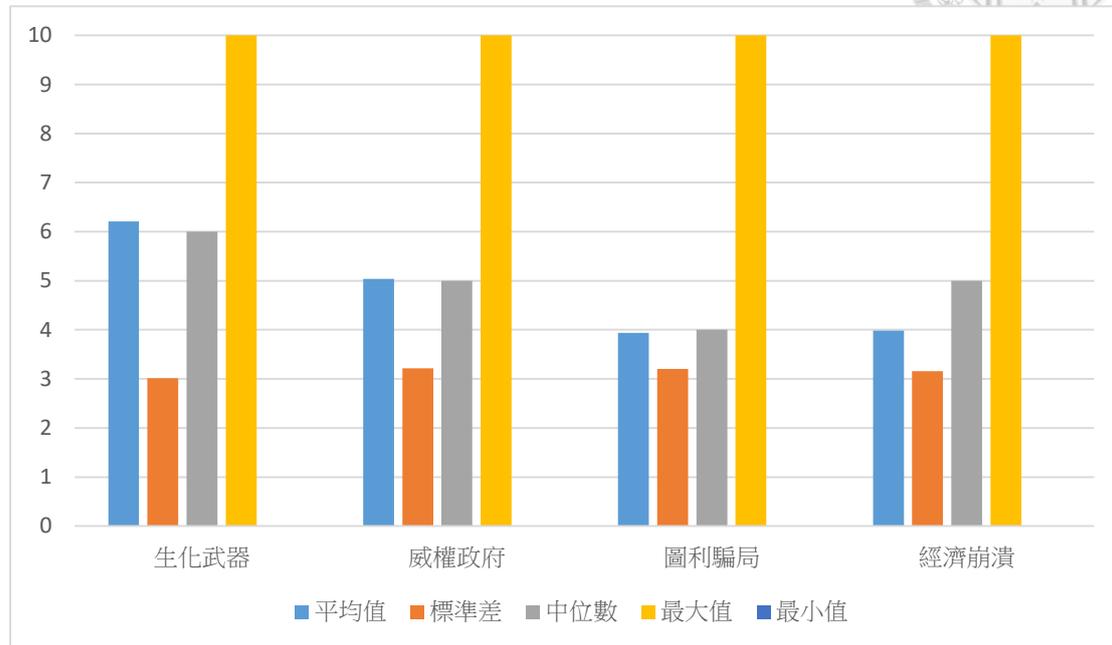
從標準差可得知四項陰謀論信念的樣本離散程度相當接近，意即樣本內的國人對四項陰謀論的相信程度並未因為內容的不同，而有特定陰謀論完全被信任或完全不被信任的極端分散。然而從能看出多數集中趨勢的樣本平均數或樣本中位數來看，誠如研究背景所描述的，樣本內的臺灣民眾對在我國言論市場比較常見的「生化武器」和「威權政府」兩陰謀論的確比較熟悉、相信程度較高，特別是極有可能直接聯想到「中國威脅」的「生化武器」陰謀論信念非常突出，其平均數和中位數皆比「威權政府」說高出一個單位左右。

相對前兩項陰謀論，臺灣民眾對本地言論市場內較少見的「圖利騙局」與「經濟崩潰」兩項陰謀論信念的樣本平均值皆偏低且略遜於樣本中位數，兩者樣本平均值皆僅有 3.9 靠近 4 的水平。儘管「經濟崩潰」說的樣本中位數與「威權政府」的陰謀論信念中位數一樣都是 5，但是「經濟崩潰」與「威權政府」說的陰謀論信念平均值差了將近一個單位，這代表「經濟崩潰」說對樣本中臺灣民眾的吸引力遠低於「威權政府」說，更多人為「經濟崩潰」說的真實性打上問號，「圖利

騙局」說則最難取信於國人。



圖 4 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敘述性統計量



綜上所述，從樣本資料的敘述性統計量可初步推論，如緒論所述，臺灣民眾之所以對本地言論市場頻繁出現的「生化武器」與「威權政府」有相對偏高的陰謀論信念，應是源自於兩陰謀論明顯指涉「密謀策畫」新冠肺炎疫情的始作俑者是國人「威脅認知」(threat perception) 甚高的中國大陸政府，而這樣的威脅認知在兩岸對立的脈絡下即可視為可能提高「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 (LeVine & Campbell, 1972)、民族主義 (Rosenblatt, 1964)、以及強化國家認同 (Moskalenko et al., 2006) 的「團體間威脅認知」(perceived intergroup threat)，這項推論本文會在後續迴歸分析的章節做更進一步的解釋；反之，臺灣民眾對「圖利騙局」與「經濟崩潰」兩項在本地言論市場中較少因此較不熟悉，且未能觸發國人產生動機性推理的陰謀論相信程度較低。

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敘述性統計的初步結果顯示國外現有研究對新冠肺炎陰謀論常見的分類方法：拒絕承擔責任的「轉移焦點」(deflect) 型陰謀論、和否定新冠肺炎存在或看低疫情嚴重性的「否定現實」(denial) 型陰謀論 (Frankovic, 2020; Imhoff & Lamberty, 2020; Sternisko et al., 2020) 可能無法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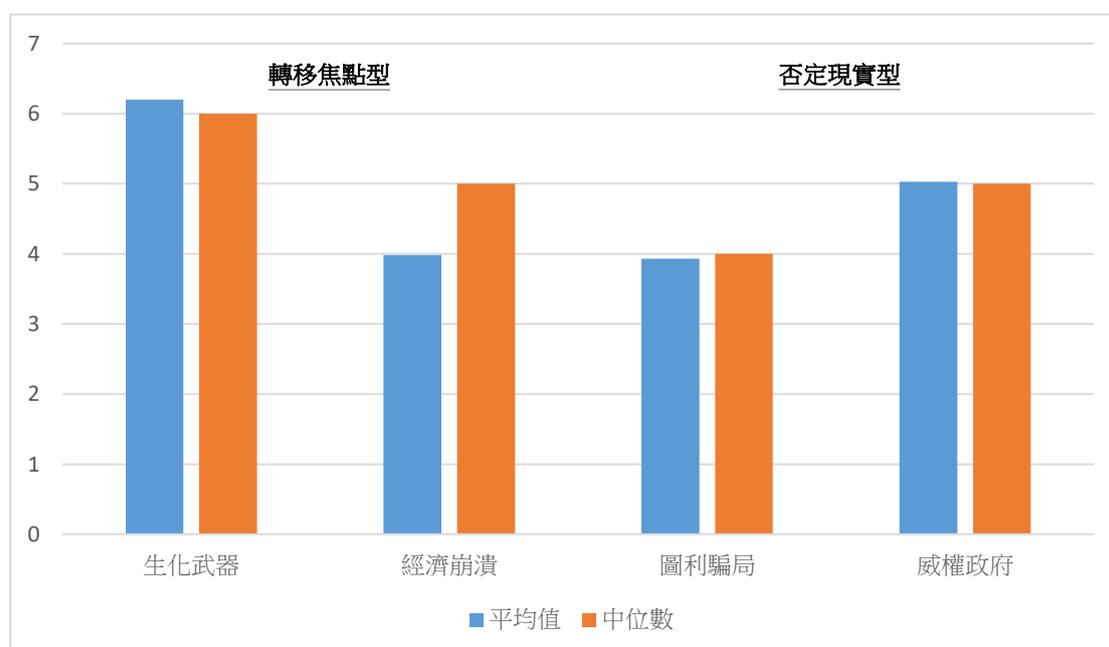


區分出臺灣民眾的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高低。

若要用「轉移焦點」與「否定現實」兩個標籤區分本文探討的四項陰謀論，「生化武器」與「經濟崩潰」兩項陰謀論應屬於「轉移焦點」型陰謀論，而「威權政府」與「圖利騙局」則屬於「否定現實」的陰謀論。

我們可以明顯發現「轉移焦點」型陰謀論皆主張新冠肺炎存在，但其拒絕接納科學證據，意圖將受眾的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人事物，如「生化武器」說指控新冠肺炎是「科學家所製造的生化武器」，而「經濟崩潰」說則隱射新冠肺炎是「掩蓋全球崩潰創造的」；「否定現實」型的兩陰謀論同樣迴避科學理性、明確指涉陰謀策畫的對象和目的，但是「否定現實」型陰謀論更進一步的挑戰新冠肺炎疫情的真實性，如「威權政府」說形容新冠肺炎是為了「永久剝奪公民權利與建立威權政府的陰謀」，而「圖利騙局」說更明白地將疫情形容為「利益團體的圖利騙局」，雙雙否定新冠肺炎的存在。

圖 5 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轉移焦點／否定現實比較



從圖 4 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在樣本資料中，「轉移焦點」或「否定現實」這兩種依照新冠肺炎陰謀論意圖的分類方式顯然並非指引臺灣民眾是否相信特定陰謀論的依據。回到 2020 年 5 月的時空背景，本文主張上述分類在國外可行但在

我國失效的事實，正好反映我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新冠肺炎陰謀論相關研究主要進行地英美歐的防疫表現落差，由於無論主客觀、臺灣的防疫表現都相對好上不少，故臺灣民眾是否相信特定新冠肺炎陰謀論的動機即無法用「轉移焦點」或「否定現實」與否來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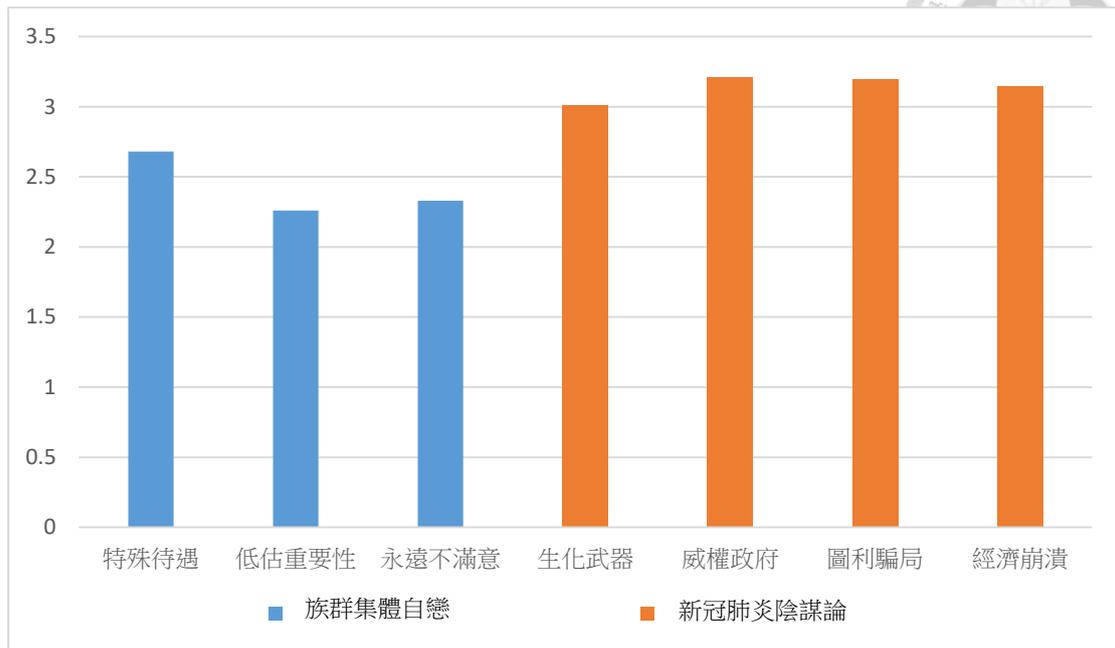
## (二) 族群集體自戀

表 1 族群集體自戀的敘述性統計量

	平均值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特殊待遇	4.536	2.680	5	10	0
低估重要性	5.527	2.267	5	10	0
永遠不滿意	5.036	2.336	5	10	0
族群集體自戀	5.03	1.985	5	10	0

觀察樣本平均值和標準差皆可得知樣本中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傾向並不特別高漲，中位數與平均值皆在 11 點量表的中間值上下 0.5 單位左右。另外，儘管族群集體自戀與陰謀論信念皆屬於政治態度的一環，但從樣本標準差的比較即可發現國人對各自族群集體自戀的分散程度明顯不如陰謀論信念。由此本文初步推論，臺灣民眾長期形塑的、對各自族群的正面群體形象認知，會明顯比短期爆發的單一外在事件有更高的共識。而在下一個章節，本文將會進一步透過嚴謹的迴歸模型設定探討究竟族群集體自戀是否為影響臺灣民眾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最重要因素。

圖 6 族群集體自戀／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標準差比較



進一步比較集體自戀三道題目的樣本平均值，本文發現敘述性統計的結果頗符合應然面上臺灣民眾受我國特殊歷史背景影響對群體形象認知的直觀想像。本文認為，從三道題目中認同度最高的「並不是很多人了解我的族群的重要性」就可以觀察出國人對外政治態度上明顯的「相對剝削感」，而此相對剝削感明顯源於我國長年受到中國大陸政府打壓且在國際社會各領域的參與頻頻受阻，被認可「一中原則」或「一中政策」的世界各國以及國際組織排斥；其次，能主客觀精準描繪臺灣民眾受打壓產生的義憤感的「在我的族群得到應得的肯認前我永遠不會感到滿意」則位列次高的認同程度；最後，樣本資料中代表特權感的「我的族群值得享有特殊待遇」則得到最低的分數。

本文認為進一步可從兩個方面釐清上述現象：首先，相對剝削感明顯地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被強化。本文推論臺灣民眾無論是單一還是雙重認同者，都在疫情下更深刻地感受到即使我國防疫做得再好，好表現如何受到外媒、外國專家學者、部分主權國家政府認可，甚至在政府啟動了大規模的口罩外交「Taiwan Can Help」後，我國所達成的外交突破仍非常有限。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在 2020 年 5 月 19 日仍拒絕授予我國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衛生福利部, 2020)。

其次，圖 5 顯示樣本資料中臺灣民眾的「台灣人認同」程度非常高，中位數達 10 即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者回答自己百分之百是臺灣人。而歷來研究皆顯示台灣人認同者對長年打壓我國的中國大陸較有敵意，特別當族群認同含有本質論的民族主義時（吳乃德，1996, 2005; 江宜樺，1998），這種群體認同所導致的對外防禦性、攻擊性都有可能上升（楊婉瑩、張雅雯，2016），而客觀數據又顯示臺灣民眾普遍對政府有高度的正面形象認知（TVBS 民意調查中心，2020a, 2020b, 2020c），因此本文合理推論上述「對內認知非常正面、對外認知非常負面」的心理狀態即是樣本資料所觀察到的族群集體自戀。

表 2 台灣人認同的敘述性統計量

	平均值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我是台灣人	8.893	1.983	10	10	0
台灣人認同重要性	8.001	2.290	9	10	0
臺灣人認同	8.447	1.938	9	10	0

本文認為，以上初步的分析不只是研究國人政治態度的重要發現，更是深化我國政治學界中針對政治態度「理性自利」還是「感性認同」，何者對兩岸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影響力較大的契機。所謂的「感性認同」，絕不能侷限在單純對內或對外的正向、負面情感認同，臺灣特殊的歷史背景加上 21 世紀全球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再起的風潮，我們絕對有必要將感性認同的研究範圍擴大，更進一步探討單向的情感認同將如何影響對外的政治態度，以及兩者間的動態變化。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我國學術界、政治實務界都應該更關注「集體自戀」這個對內過度正向、但可能會造成嚴重負面對外政治態度的心理狀態，本文後續將透過迴歸分析以及結論，進一步提出相關看法和此心理學概念的重要性。

### (三) 控制變項



表 3 控制變項的敘述性統計量

	平均值	標準差	中位數	最大值	最小值
<i>政治因素</i>					
聯合報公信力	0.138	0.345	0	1	0
自由時報公信力	0.161	0.368	0	1	0
蘋果日報公信力	0.124	0.329	0	1	0
臺灣人認同	8.447	1.938	9	10	0
<i>社會因素</i>					
教育程度	1.691	0.554	2	2	0
家戶收入	1.527	1.453	1	7	0
<i>心理認知動機</i>					
開放心態	7.075	1.588	7.17	10	3.5
<i>心理存續動機</i>					
心理幸福感	5.717	2.051	6	10	0
新冠風險認知	34.795	25.000	36	100	0
個人控制感	5.663	1.713	5.5	10	0
<i>心理社會動機</i>					
個人自戀	4.579	1.794	4.67	10	0
<i>其他</i>					
年齡	1.996	1.369	2	4	0
性別	0.497	0.500	0	1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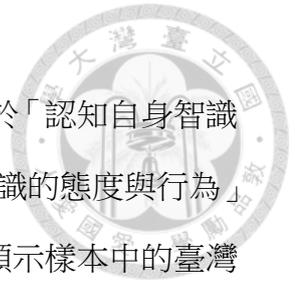
本文將 Douglas et al.(2019)文中所指出對陰謀論信念會產生影響的各政治、社會、以及心理因素認知、存續、社會等三動機納入控制。

政治因素中，平均值顯示樣本中的我國民眾對媒體極度不信任，民眾對各立場媒體的公信力都極度低落，在十一點量表中的平均得分連 1 分都不到，本土立場鮮明的自由時報比聯合報、蘋果日報的公信力略高，立場偏藍的聯合報和抗中傾向明確的蘋果日報則依序位列第二與第三。

社會因素中，樣本資料中的臺灣民眾過半數最高學歷皆在大學和四技二專以上，家戶收入的平均則落在 50 到 99 萬與 100 到 149 萬之間，樣本資料的女性約

略多於男生，年齡的平均則靠近編碼為「2」的 40 到 49 歲。

三項心理因素的認知動機顯示，樣本資料中的臺灣民眾對於「認知自身智識與他人相比擁有侷限性和不顧他人身分地位仍願意向其請教知識的態度與行為」的自我認知持十一點量表中 7 分以上的高度開放。存續動機則顯示樣本中的臺灣民眾對新冠肺炎帶來的正常生活威脅感並不強烈，生活開心與否的心理幸福感、以及對疫情下生活的掌握程度皆高於 5，且平均僅有 34.8%的民眾認為自己在一年內有染病的機率。心理因素社會動機的個人自戀平均僅 4.579、中位數 4.67，兩者皆低於族群集體自戀，顯示樣本資料中的臺灣民眾對所屬族群的正面認知高於對自身的正面形象感受。



## 二、迴歸分析

本節呈現並分析迴歸模型驗證本文研究假設：**若其他條件不變，當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程度越高，其對新冠肺炎陰謀論相信程度越高。**本節將逐一討論自變項「族群集體自戀」對四項陰謀論的陰謀論信念的迴歸結果，詮釋統計結果背後涉及的理論意義，並提供初步的分析與討論。

除此之外，從文獻回顧章節即可看出，由於國外既有研究皆指出集體自戀者之所以會對外在個人、群體、事物產生負面政治態度，關鍵在於集體自戀者感受到其膨脹的群體認同受到上述外在對象的「形象威脅」(Image Threat)。然而誠如緒論所述，由於我國在 2020 年 5 月、也就是本文網路問卷調查期間的時空背景下國內疫情並不嚴重，故從最嚴謹的角度出發，本文無法參考國外研究推定新冠肺炎疫情本身就是集體自戀者群體認同的形象威脅。因此，本節也將透過迴歸模型中的控制變項，嘗試初步辨認我國集體自戀者的形象威脅來源，並對此做出初步的討論與分析。

表 4 迴歸分析結果表

自變項	依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			
	(1) 生化武器	(2) 威權政府	(3) 圖利騙局	(4) 經濟崩潰
族群集體自戀	0.24*** (0.05)	0.33*** (0.05)	0.43*** (0.05)	0.44*** (0.05)
<i>控制變項：政治因素</i>				
臺灣人認同	0.52*** (0.05)	0.32*** (0.06)	0.05 (0.06)	0.04 (0.06)
聯合報公信力	0.19 (0.29)	-0.01 (0.32)	-0.25 (0.32)	-0.26 (0.32)
自由時報公信力	0.02 (0.28)	0.34 (0.30)	0.33 (0.30)	0.36 (0.30)
蘋果日報公信力	-0.19 (0.31)	-0.42 (0.34)	-0.02 (0.34)	-0.13 (0.33)
<i>控制變項：社會因素</i>				
家戶收入	0.02 (0.09)	-0.01 (0.10)	-0.10 (0.10)	-0.15 (0.10)
教育程度	-0.26 (0.19)	-0.50** (0.21)	-0.47** (0.21)	-0.51** (0.20)
<i>控制變項：心理認知動機</i>				
開放心態	-0.04 (0.06)	-0.06 (0.07)	-0.03 (0.07)	-0.05 (0.07)
<i>控制變項：心理存續動機</i>				
新冠肺炎風險認知	0.00 (0.00)	0.00 (0.00)	0.01** (0.00)	0.01*** (0.00)
個人控制感	0.06 (0.08)	0.06 (0.09)	0.05 (0.09)	0.07 (0.09)
心理幸福感	-0.00 (0.05)	-0.00 (0.05)	0.06 (0.05)	0.02 (0.05)
<i>控制變項：心理社會動機</i>				
個人自戀	-0.04 (0.06)	-0.01 (0.06)	-0.04 (0.06)	-0.05 (0.06)
R <sup>2</sup>	0.154	0.101	0.0986	0.112
觀察值	833	833	833	833

\*\*\* p<0.01, \*\* p<0.05, \* p<0.1，括弧內為標準誤。

完整迴歸分析結果分析表放至附錄一。

## (一) 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與新冠肺炎陰謀論



如表 7 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對「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圖利騙局」、還是「經濟崩潰」哪一個陰謀論，樣本資料中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都對新冠肺炎陰謀論的相信程度達到極高的統計顯著性。模型中的族群集體自戀每增加一單位，「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圖利騙局」、「經濟崩潰」等四項陰謀論分別會提升 0.24、0.33、0.43、0.44，迴歸分析結果符合本文研究假設：若其他條件不變，當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程度越高，其對新冠肺炎陰謀論的相信程度越高。

本文的迴歸分析結果有兩項重要的理論和實務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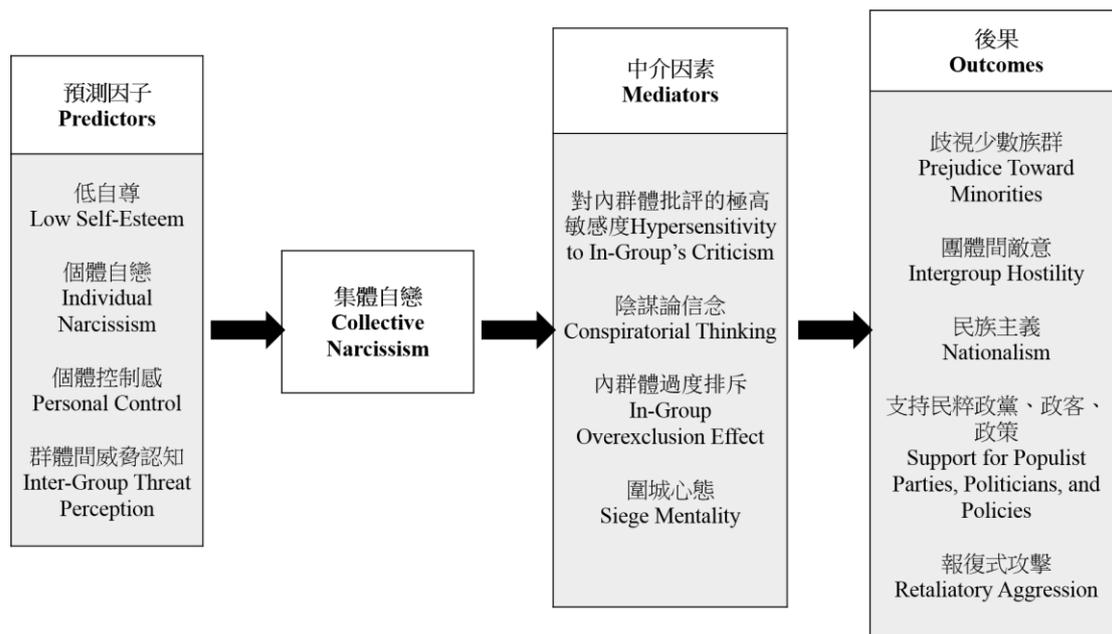
首先，四迴歸模型皆指出集體自戀與新冠肺炎陰謀論有高度統計顯著性，這代表當臺灣民眾已經對各所屬族群產生集體自戀傾向時，民眾在面對各種不同的新冠肺炎陰謀論，都可能產生更高的相信程度。以本文中四個迴歸模型中的四項陰謀論來說，這代表當臺灣民眾越認為「自己的族群應該享有特殊待遇」、「所屬族群沒受到應有的肯認」、「在我的族群得到應得的肯認前我永遠不會感到滿意」，臺灣民眾就越有可能相信新冠肺炎是「科學家所製造的生化武器」、「意圖永久剝奪公民權利與建立威權政府的一項陰謀」、「利益團體為了圖利而設的騙局」、或「為了掩蓋即將到來的全球經濟崩潰而創造的」。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四項陰謀論彼此皆無關聯，其各自對新冠肺炎的起源或目的解釋也都是獨特且獨立的，因此這些在陰謀論的相關研究中屬於 (Abalakina-Paap et al., 1999)，而非須由特定量表測驗的「普遍性」(general) 陰謀論 (Vitriol & Marsh, 2018)。所以儘管理論限制讓本文無法透過變項操作將特定型的陰謀論信念轉化成普遍性陰謀論信念或「普遍性陰謀論世界觀」(general conspiracy worldview) (Imhoff & Lamberty, 2020)，然而當四項截然不同的陰謀論信念都與臺灣民眾的集體自戀傾向達到極高的統計顯著性，本文認為我們可以負責任地推論當臺灣民眾越過份熱愛各自的族群形象時，這些族群集體自戀者就

比一般人有更高的機率相信這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以外的其他新冠肺炎陰謀論。

其次，從表 7 中我們即能看出臺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相較其他變項對新冠肺炎陰謀論有橫跨不同脈絡的解釋力，而這樣的解釋力讓本文認為我們或許可順著集體自戀相關研究架構，進一步推論 2020 年 5 月的時空背景下台灣民眾對外展露出的明顯負面政治態度從何而來。

圖 7 集體自戀相關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Golec de Zavala, A., & D. Lantos. 2020.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The Bad and the Ugl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0, 29(3) 274, 作者自行翻譯、製圖。

圖 4 顯示學界研究目前有關集體自戀產生的各種「後果」(outcome) 清一色都是負面的對外政治態度，如優勢團體對少數群體的歧視 (Golec de Zavala & Cichocka, 2012; Marchlewska et al., 2020; Zemojtel-Piotrowska et al., 2020)、支持美國前總統川普和英國強硬脫歐派的民粹政治 (Cislak et al., 2020; Federico & Golec de Zavala, 2018; Marchlewska et al., 2018; Golec de Zavala & Keenan, 2021)、民族主義 (Cichocka & Cislak, 2020; Federico et al., 2021)、以及集體自戀者對形象威脅帶有敵意的肢體或言語報復 (Dyduch-Hazar et al., 2019;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16, 2013; Guerra et al., 2020)。



運用表 4 的集體自戀研究架構，本文於此提出不同於政治因素對台灣民眾在 2020 年 5 月的時空背景下產生負面對外政治態度的解釋。本文合理推論，台灣民眾對新冠肺炎堅持使用有汙名化疑慮的「武漢肺炎」以及對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的種族歧視言論，這些明顯具有**敵意、歧視、報復意圖**的言語，都是在認為台灣防疫極佳但「**沒有受到足夠的肯認**」進而產生集體自戀傾向時並加上新冠肺炎陰謀論這個「中介因素」(mediator)的影響，讓許多相信新冠肺炎是生化武器、威權政府的台灣民眾對新冠肺炎憤而使用具有汙名化疑慮的武漢肺炎稱謂新冠肺炎；與此同時，這些取信於新冠肺炎的集體自戀者也有更高的機率會對未肯定台灣防疫成果、未給予台灣觀察員地位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以種族歧視稱呼辱罵之。簡言之，本文認為，**武漢肺炎和譚德塞被以黑鬼辱罵都是集體自戀加上新冠肺炎陰謀論這個中介因素產生的報復性後果。**

最後，依循本文「理論建構與假設」章節提出的前提預設：集體自戀者對所屬群體的形象威脅極度敏感，所以集體自戀者容易對無論是團體、個人、還是事物的**形象威脅產生偏見**。前面兩個部分本文已經陸續討論了偏見、也就是中介因素新冠肺炎陰謀論，並進一步延伸推論出報復性質的後果，而為了讓本文提供更完整的理論建構，本文認為有必要將焦點轉往邏輯鍊的第一段，也就是辨認出台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者心目中族群正面形象的**威脅來源**。

初步討論，我們可發現英美兩國國家集體自戀者的國家形象威脅來源明確：就是在 2020 年上半年接近失控的新冠肺炎疫情，疫情讓英美政府左支右絀且廣受民眾和媒體批評，形象顯然受到重挫。然而誠如本文不斷強調的，台灣在當年的時空背景之下與英美兩國的疫情發展狀況截然不同，台灣民眾對總統、行政院長、以及政府防疫表現都給予非常高的評價，台灣的國際形象甚至有顯著的提升。本文因此認為，辨認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者的形象威脅來源不只有釐清集體自戀如何在不同社會脈絡仍導致相似結果的理論意義，更有在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消退的當下，透過降低形象威脅防杜新冠肺炎陰謀論引發更多社會成本、的實務價值。

本文將在下一個小節聚焦分析和討論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者所感知的形象



來源。本文將嘗試探討對台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者來說，其族群形象威脅是否有所不同？而這樣的形象威脅，是否背後可能涉及其他「威脅認知」(threat perception) 相關概念，進而讓集體自戀者選擇相信這些看似荒誕的新冠肺炎陰謀論？

## (二) 臺灣族群集體自戀者的形象威脅來源

表 5 四陰謀論信念的樣本平均值

生化武器	威權政府	圖利騙局	經濟崩潰
6.208	5.034	3.938	3.983

從敘述性統計的結果，本文初步推斷台灣民眾對「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和「圖利騙局」、「經濟崩潰」四陰謀論信念的動差異，反映在前兩項陰謀論容易讓台灣人產生對中國大陸政府的「團體間威脅認知」；而後兩者因為在台灣時空背景下的言論市場非常少見因此自然陰謀論信念偏低。奠基於敘述性統計的結果，本章節嘗試進一步透過迴歸分析明確辨認出在集體自戀相關研究中讓集體自戀者相信特定陰謀論的「形象威脅」(image threat)，找出究竟對台灣族群集體自戀者來說何種因素為其心目中正面族群形象的形象威脅。

從迴歸模型中，本文認為以下兩項控制變項：政治因素的「台灣人認同」和心理因素存續動機的「新冠肺炎風險認知」可辨認出族群集體自戀者心目中的正面群體形象威脅。

以「台灣人認同」對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影響來看，迴歸分析指出台灣人認同僅對「生化武器」和「威權政府」說達高度統計顯著正相關，樣本資料中臺灣民眾的台灣人認同在 0 到 10 的滑梯量表上每增加一單位，分別會對「生化武器」和「威權政府」兩項陰謀論增加 0.52 以及 0.32 的陰謀論相信程度，台灣人認同儘管針對「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兩項陰謀論信念也有正值的迴歸係數，但未皆達統計顯著性。

過往有關臺灣民眾對外政治態度的研究皆顯示「台灣人認同」相對台灣人與

中國人兼具的「雙重認同」較容易對中國大陸產生敵意（Yang, 2016; 蒙志成，2016; 關弘昌，2018; 陳映男等，2015; 陳陸輝等，2009），2020 上半年的民調顯示絕大多數的臺灣民眾除了不再視「中國大陸政府為朋友」（中國效應研究小組，2020），台灣人認同者更強烈認為「中國因為隱瞞疫情所以要負起最大責任」（風傳媒，2020b）。本文因此主張台灣人認同對「生化武器」和「威權政府」兩項陰謀論信念的顯著提升，正好反映台灣人認同者對中國大陸的敵意和新冠肺炎疫情下加劇的不信任感，「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說則因為無涉政治因素因此與台灣人認同的相關性不顯著。

透過迴歸分析的檢證，本文認為對擁有「台灣人認同」的族群集體自戀者來說，能明確聯想到中國大陸政府長年在外交場合排擠台灣、文攻武赫、甚至在2020年5月的問卷調查的時空背景下阻止我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生化武器」和「威權政府」的新冠肺炎陰謀論，即讓台灣人認同者在面對這兩項陰謀論所產生的族群形象威脅就是面對中國大陸極權政府所產生的威脅認知。

形象威脅認知之所以可能增加族群集體自戀者對外群體的陰謀論信念則可進一步透過 Branscombe et al. (1999) 提出的「排斥－認同模型」(Rejection-Identification Model) 釐清。「排斥－認同模型」主張優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持續歧視會讓個人感受到「排斥」(exclusion) 和「拒絕」(rejection)，排斥與拒絕進而威脅到弱勢群體中個人的「群體幸福感」(Collective Well-Being) 與「個體幸福感」(Personal Well-Being)，然而如果個人此時選擇將歧視歸因於外群體的歧視而非自身或所屬群體本身的特質，則內群體個人的群體認同將有所提升、而更高的群體認同就有助於促進原本被削弱、被威脅的的個人群體幸福感 (Branscombe et al., 1999; Branscombe & Wann, 1994)。在兩岸關係的脈絡下，我們即能明顯看出中國大陸對台灣人認同族群的長年歧視容易讓此族群感受到群體幸福感跟個體幸福感受到威脅，因此對台灣人認同者來說將我國即使防疫有成卻仍被中國大陸在國際上排擠、拒絕歸因於中國大陸政府在新冠肺炎上的陰謀，如新冠肺炎就是中國大陸製造的生化武器、是中國大陸威權政府的陰謀，在心理上即有助其維

持群體和個體的幸福感。

而當我們觀察迴歸分析中「新冠肺炎風險認知」對四項陰謀論產稱的影響，其僅對「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說達高度統計顯著正相關，樣本資料中臺灣民眾若主觀認為自己未來一年內的染病機率每增加 1%、就會提升臺灣民眾對「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兩項陰謀論 0.01 的相信程度，這代表臺灣民眾如果越認為自己未來有可能染疫就越相信「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是新冠肺炎的起源。

對此，本文推論「新冠肺炎風險認知」為集體自戀者對族群集體自戀者的形象威脅，而其關鍵原因在於當族群集體自戀者看待「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兩說時儘管難以觸發政治因素，但其威脅到我國在未來一年內的民生經濟發展，即若族群集體自戀者越相信新冠肺炎疫情在未來一年爆發的可能越高、越可能威脅到問卷調查時空背景下我國表現相對穩健的經濟狀況，因此風險認知才成為族群集體自戀者在面對「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兩說時觸發的族群正面形象威脅。

綜上所述，本文推論樣本資料中的族群集體自戀者在「生化武器」和「威權政府」說感受到新冠肺炎對群體正面形象威脅源於中國大陸長年對台灣的歧視所造成的排斥和拒絕；族群集體自戀者在「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說感受到的族群形象威脅源於個人對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所帶來的染病風險對我國經濟表現的衝擊。所以就實務層面來說，本文認為以台灣的時空背景和政經脈絡下來看，若我國政府能有效降低國內各族群對中國大陸政府的威脅認知或對新冠肺炎染疫的風險認知，就有很高的機率能減少國人相信新冠肺炎陰謀論的程度、降低其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

然而分析至此，本文仍尚待解釋直觀上台灣人認同與族群集體自戀顯而易見的交互影響，故在下一個章節中，本文將透過設定族群集體自戀與台灣人認同的交互作用項，嘗試觀察對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來說，台灣人認同對族群集體自戀的交互影響究竟為何。

### (三) 台灣人認同對族群集體自戀的調節作用



表 6 交互作用項迴歸分析結果表

依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				
自變項	(1) 生化武器	(2) 威權政府	(3) 圖利騙局	(4) 經濟崩潰
族群集體自戀 X 台灣人認同	0.06** (-0.02)	0.06** (-0.03)	0.09*** (-0.03)	0.09*** (-0.03)
族群集體自戀	-0.27 (-0.21)	-0.17 (-0.23)	-0.34 (-0.23)	-0.32 (-0.23)
控制變項：政治因素				
台灣人認同	0.22* (-0.13)	0.02 (-0.14)	-0.39*** (-0.14)	-0.4*** (-0.14)
聯合報公信力	0.15 (-0.29)	-0.04 (-0.32)	-0.31 (-0.32)	-0.32 (-0.31)
自由時報公信力	0.01 (-0.28)	0.34 (-0.3)	0.33 (-0.3)	0.35 (-0.29)
蘋果日報公信力	-0.21 (-0.31)	-0.44 (-0.34)	-0.06 (-0.34)	-0.17 (-0.33)
控制變項：心理因素				
家戶收入	0.01 (-0.09)	-0.02 (-0.1)	-0.12 (-0.1)	-0.17* (-0.1)
教育程度	-0.23 (-0.19)	-0.47** (-0.21)	-0.43** (-0.21)	-0.47** (-0.2)
開放心態	-0.05 (-0.07)	-0.06 (-0.07)	-0.03 (-0.07)	-0.05 (-0.07)
新冠肺炎風險認知	0.00 (0)	0.00 (0)	0.01** (0)	0.01*** (0)
個人控制感	0.05 (-0.08)	0.05 (-0.09)	0.04 (-0.09)	0.06 (-0.09)
心理幸福感	0 (-0.05)	0 (-0.05)	0.06 (-0.05)	0.02 (-0.05)
個人自戀	-0.02 (-0.06)	-0.01 (-0.06)	-0.03 (-0.06)	-0.04 (-0.06)
R <sup>2</sup>	0.16	0.1066	0.1112	0.125
觀察值	833	833	833	833

\*\*\* p<0.01, \*\* p<0.05, \* p<0.1，括弧內為標準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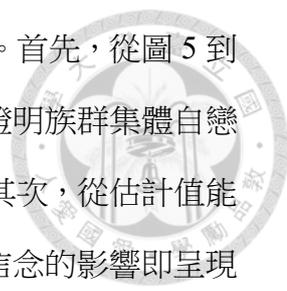
完整迴歸分析結果分析表放至附錄二。

當我們重新檢視集體自戀的內涵，相關研究指出集體自戀就是「群體認同感」(Group Identification)的一種，但這種群體認同感和個人情緒性投注於所屬群體「無比偉大的」不切實際信仰密不可分，因此集體自戀就是個人對所屬群體所產生的自我膨脹群體形象認知，是需要個人持續感受到外界崇拜才得以維持群體同感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Golec de Zavala & Lantos, 2020)。由此可見，我們可以將集體自戀視為一種群體認同，而這在本文的研究架構中即是族群認同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產生的自戀式、以及自我膨脹群體的形象認知，因此族群集體自戀和台灣人認同必然有其關聯和互相影響的可能。為此，本文透過在複迴歸模型中將「台灣人認同」與「族群集體自戀」設定交互作用項，嘗試從兩者間的調節作用進一步觀察其交互影響的趨勢。

從表 9 我們即可以明顯觀察到「台灣人認同」和「族群集體自戀」兩者的交互作用項對「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圖利騙局」、「經濟崩潰」等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皆達到高度的統計顯著性。模型中的交互作用項每提高一單位，四項新冠陰謀論信念分別會額外提升 0.06、0.06、0.09、0.09，證明兩者存在交互作用。進一步分析此迴歸模型的統計結果，這代表「族群集體自戀」對「台灣人認同」有顯而易見的調節作用，即「台灣人認同」越高者、越容易受到「族群集體自戀」的影響進而更加相信「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圖利騙局」、「經濟崩潰」等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真實可信。

本文透過 Hainmueller et al. (2019) 主張能更精確剖析調節作用項的「分箱估計量」(Binning Estimator) 觀察交互作用的變化，並同時檢查交互作用係數的準確性。四圖中 X 軸上的長條圖為族群集體自戀的分配，其「L」、「M」、「H」為依照 X 軸、族群集體自戀由最小值到最大值的三等份，迴歸線則是原始迴歸模型交互作用項的迴歸線，空心圓點所在的 Y 軸點為各組調節作用估計出來的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值和誤差區間，空心圓點的 X 軸點則是各組族群集體自戀的中位數。

分箱估計量能呈現出這三組族群集體自戀和台灣人認同的交互作用對各新



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估計值是否準確，且調節是否為線性作用。首先，從圖 5 到圖 8 我們能明顯看出無論對哪一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都能證明族群集體自戀對台灣人認同的調節確實為線性作用，因此估計值頗為準確；其次，從估計值能具體看出，集體自戀程度越高，台灣人認同對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影響即呈現明顯的正面影響，證明相較族群集體自戀程度低的台灣人認同者來說，族群集體自戀程度的上升確實會激發台灣人認同對新冠肺炎陰謀論的相信程度。

從加入「台灣人認同」和「族群集體自戀」交互作用項的複迴歸模型中，本文發現對新冠肺炎陰謀論的相信程度來說，當台灣人認同者越對台灣這個群體認同感產生高程度的自戀式、自我膨脹式的族群集體自戀群體認同，台灣人認同者確實會在面對各種不同的新冠肺炎陰謀論時產生更高的相信程度。而這樣的調節作用即是加深台灣人相信新冠肺炎是「科學家所製造的生化武器」、「意圖永久剝奪公民權利與建立威權政府的一項陰謀」、「利益團體為了圖利而設的騙局」、以及「為了掩蓋即將到來的全球經濟崩潰而創造的」等負面的對外政治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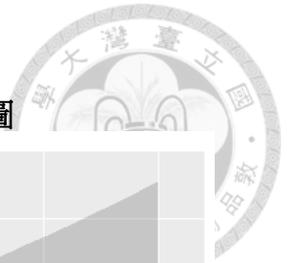


圖 8 交互作用項對生化武器陰謀論信念的估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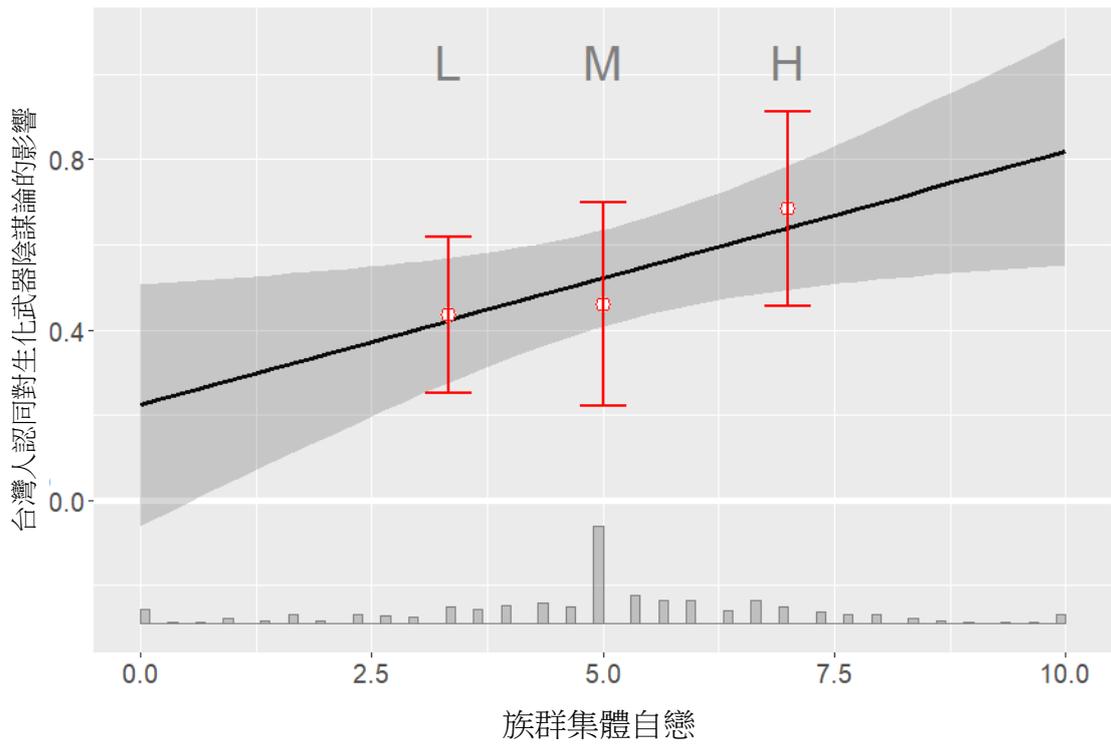


圖 9 交互作用項對威權政府陰謀論信念的估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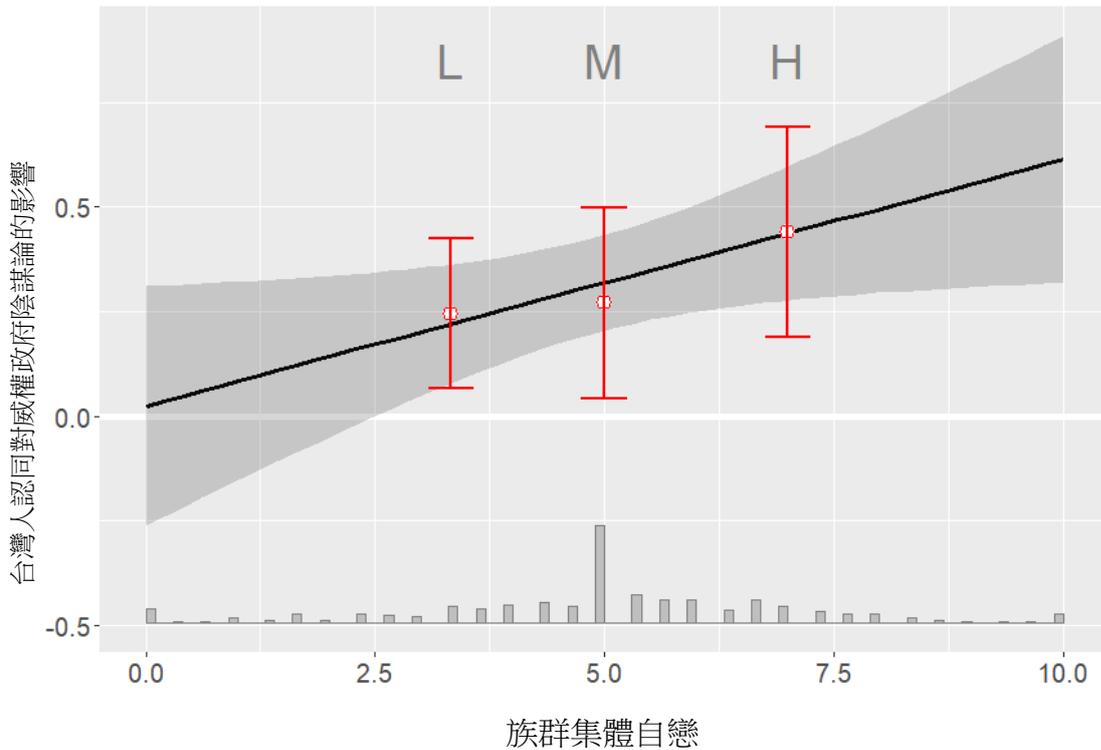


圖 10 交互作用項對圖利騙局陰謀論信念的估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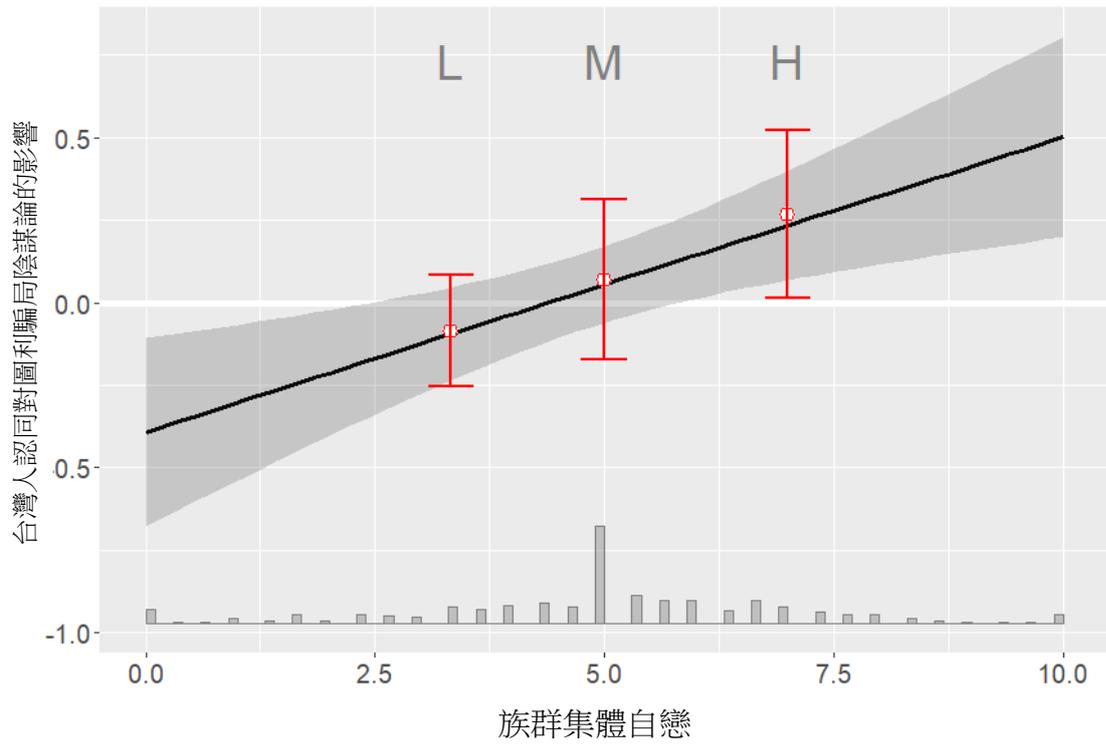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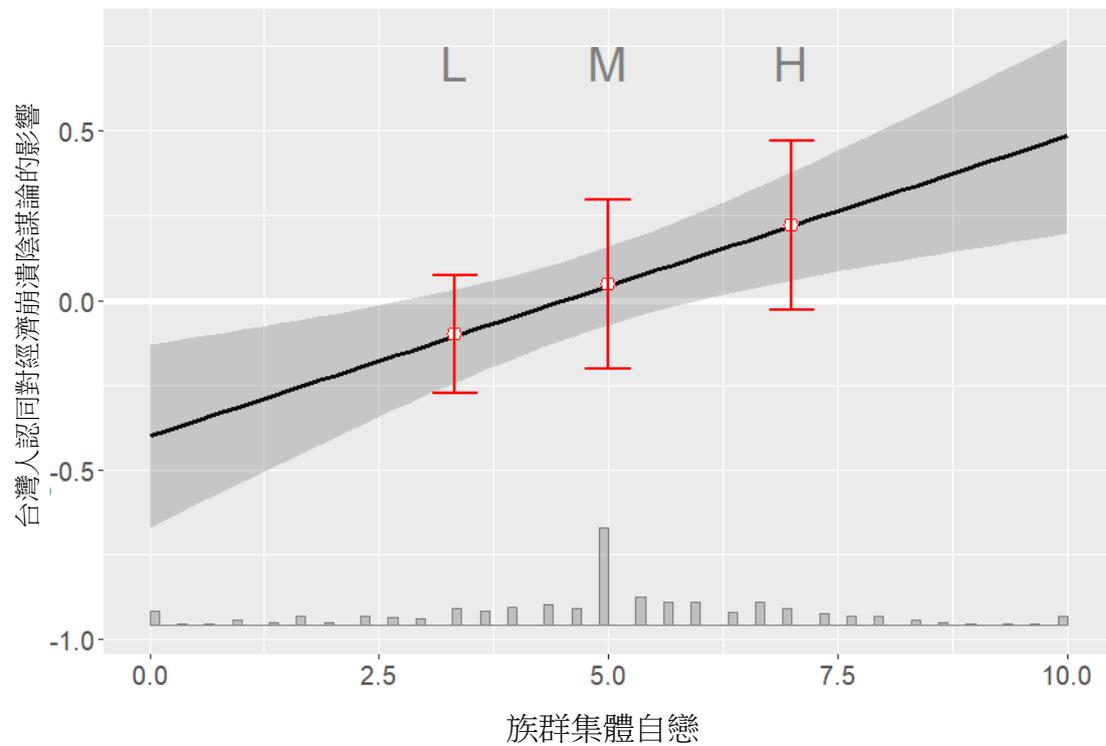


圖 11 交互作用項對經濟崩潰陰謀論信念的估計圖



## 伍、結論



本文透過以上四個章節完成了在 2020 年 5 月新冠肺炎疫情下臺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與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經驗性探索。

本文採用「新冠肺炎的社會與道德心理學國際合作計畫」(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n the Social & Moral Psychology of COVID-19, ICSMP) 於 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在臺灣蒐集的線上問卷資料，以量化方法提供符合本地脈絡對族群集體自戀與新冠肺炎陰謀論之間關連的解釋，並進一步指出台灣族群集體自戀者面對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的族群正面形象威脅，以及族群集體自戀與台灣人認同之間的相互影響為何。

在這個章節中，本文會先整理和重點摘要「研究發現與討論」章節中的實證研究發現，並在下一個子章節中說明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同時提供後續研究可延伸的研究方向與建議。

### (一) 研究發現

儘管「國家集體自戀」在英美兩國的實證研究中已被證明由於集體自戀者有「希望維持自身和群體的正面社會形象」的「社會動機」(Social Motive)(Douglas et al., 2017)，所以集體自戀者會為了保護自身過度迷戀的國家形象產生更高的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 (Sternisko et al., 2020; Hughes & Machan, 2021)。但我國無論在 2020 年 5 月當下的防疫表現和國族認同完整度的社會客觀現實條件和英美兩國都截然不同，前者廣受國外政府和外媒的一致肯定、後者則因為民眾的國族認同不完整只有族群認同，故本文遂嘗試運用量化研究的複迴歸模型提供在本地脈絡以及當下時空背景下，台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傾向是否仍可有效解釋民眾的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

首先，本文透過量化模型發現台灣民眾的族群集體自戀與新冠肺炎陰謀論有

高度統計顯著性，代表當臺灣民眾越認為「自己的族群應該享有特殊待遇」、「所屬族群沒受到應有的肯認」、「在我的族群得到應得的肯認前我永遠不會感到滿意」，臺灣民眾就越有可能相信新冠肺炎是「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圖利騙局」、「經濟崩潰」。

其次，基於我國當下的防疫表現與英美各國的狀況截然不同、即本文無法如國外的實證研究直接推斷集體自戀者形象威脅就是 2020 年上半年接近失控的新冠肺炎疫情本身，故本文進一步觀察迴歸模型的控制變項，指出台灣的族群集體自戀者在「生化武器」和「威權政府」兩項新冠肺炎陰謀論所感受到族群形象威脅源於「台灣人認同」導致的中國大陸威脅認知，而族群集體自戀者在「圖利騙局」和「經濟崩潰」說感受到的族群形象威脅則源於「新冠肺炎風險認知」中個人對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所帶來的染病風險對我國經濟表現的衝擊威脅。

最後，本文透過設定「台灣人認同」和「族群集體自戀」的交互作用項進一步釐清兩者之間的調節作用，本文發現長期穩定的「台灣人認同」對較容易受單一重大事件引發的「族群集體自戀」有顯而易見的調節作用，台灣人認同越高者越容易產生自我膨脹的族群集體自戀，而此調節作加深了集體自戀者對「生化武器」、「威權政府」、「圖利騙局」、「經濟崩潰」等四項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

總上所述，即使我國與英美兩國在 2020 年年中的新冠肺炎疫情嚴重程度和國家形象受到影響的狀況完全相反，但實證研究的結果仍表示集體自戀對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有顯著的影響，且群體認同對族群集體自戀確實存在極為明顯的調節作用。

## **(二)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文的數個變項並不完全貼近陰謀論信念相關理論中的政治、社會、以及心理因素。如本文在「政治因素」所設定的「臺灣報紙公信力」若能改以「政黨認同」測量、「社會因素」的「家庭所得」能以「個人所得」替代、「族群集體自戀」

能運用 Golec de Zavala et al. (2009) 「集體自戀量表」擁有九道題目的完整版測量，這些變項的測量都有機會更完整的呈現族群集體自戀與新冠肺炎陰謀論之間的關係。

此外，由於本研究中的「政治因素」僅有「台灣人認同」這一項，故本文難以提供在本地政治認同相關研究中廣泛使用的「台灣人認同」、「中國人認同」、以及「雙重認同」等對新冠肺炎陰謀論信念的影響和各種族群認同族群集體自戀的調節作用相關解釋。儘管「台灣人認同」在問卷施測中是以 0 到 10 的滑梯量表測量，但「台灣人認同」為 5 並無法代表受試者擁有「雙重認同」，而「台灣人認同」為 0 更無法直接推斷其擁有程度高或低的「中國人認同」。

最後，本文也有「遺漏變項」(omitted variable) 的問題，如同本文在文獻回顧所述，「心理因素」中「認知動機」的「認知閉合需求」(The Need of Cognitive Closure) 和「存續動機」中的「特質性焦慮」(Trait Anxiety)、「死亡焦慮」(Death-Related Anxiety)、以及「焦慮型依附」(Anxious Attachment Style) 都有可能是導致人們更加相信陰謀論的心理因素，故這都是未來相關研究需要在模型中控制的部分。

而針對未來的延伸性研究，本文認為可從兩個方向出發，一是以集體自戀為核心往前到其「預測因子」(Predictor)，二則是往後探索集體自戀導致的各種「後果」(Outcome)，如民族主義、民粹政治支持度、報復式攻擊和群體歧視等，這些延伸性研究都有機會更深入探討集體自戀作為一種特殊、且世界各地皆可觀察到的群體認同對政治社會產生的影響。

# 陸、參考資料



## 一、中文部分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2020，《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新聞稿) 2020/06/03 修正版》。

中央廣播電臺，2020，《未獲邀出席 WHA 總統府：高度遺憾與譴責》。

中央通訊社，2020a，《WHA 登場世衛中國拒台 各國料將聯手發聲反制》。

中央通訊社，2020b，《台灣武漢肺炎防疫全球矚目 德法美日義英等 14 國媒體借鑑》。

中央通訊社，2020c，《指涉武漢專家製造肺炎病毒 財經媒體遭推特停權》。

中央通訊社，2020d，《政大民調：台灣人認同感 67% 創歷年新高》。

中央通訊社，2020e，《防疫新生活／台灣疫情為什麼沒大爆發？公衛手段及好運氣》。

中央通訊社，2020f，《防疫新生活／武漢肺炎抗疫總回顧 影響決策 8 事件》。

中央通訊社，2020g，《阿滴號召全民加入 共同響應 TaiwanCanHelp》。

中央通訊社，2021，《蘇貞昌：稱武漢肺炎是有利辨識 不涉評價》。

中時新聞網，2020，《傳新冠病毒是生化武器 美專家闢謠》。

天下雜誌，2020，《學者 3 數據，揪台灣人都怎麼〈罵〉譚德塞》。

外交部，2020，《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中華民國外交部全球資訊網。

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2020，《修 0429\_各國感謝臺灣捐贈防疫物資一覽表》。

吳乃德，2005，〈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9(2)：5-39。

吳重禮、廖彥傑、楊和縉，2016，〈亦敵亦友：臺灣民眾對中國印象的評價〉，《社會科學論叢》，10(2)：61-95。

- 自由時報電子報，2020，《國際生化武器權威：武漢肺炎可能來自人工合成》。
- 風傳媒，2020a，《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受新冠肺炎衝擊？超過 8 成民眾自認〈台灣人〉》。
- 風傳媒，2020b，《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超越族群、黨派 7 成 6 民眾認為中國要為隱瞞新冠肺炎疫情負責》。
- 風傳媒，2020c，《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近 7 成台灣人不信中國防疫能力 游盈隆：兩岸互動成焦點》。
- 耿曙、劉嘉薇、陳陸輝，2009，〈打破維持現狀的迷思：台灣民眾統獨抉擇中理念與務實的兩難〉，《台灣政治學刊》，13(2)：3-56。
- 張傳賢、黃紀，2011，〈政黨競爭與台灣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間的聯結〉，《台灣政治學刊》，15(1)：3-71。
- 陳映男、耿曙、陳陸輝，2015，〈依違於大我，小我之間：解讀臺灣民眾對兩岸經貿交流的心理糾結〉，《台灣政治學刊》，20(1)：1-59。
- 陳陸輝、耿曙、涂萍蘭、黃冠博，2009，〈理性自利或感性認同？影響台灣民眾兩岸經貿立場因素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27(2)：87-125。
- 陳陸輝、耿曙、王德育，2009，〈兩岸關係與 2008 年台灣總統大選：認同，利益，威脅與選民投票取向〉，《選舉研究》，16(2)：1-22。
- 童涵浦，2020，《病毒是生化武器？台灣政治地景與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陰謀論》，記疫。
- 衛生福利部，2020a，《國外媒體報導》，衛生福利部官方網站。
- 衛生福利部，2020b，《我未受邀出席 WHA 之聲明》，衛生福利部官方網站。
- 衛生福利部，2021，《臺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 19)防疫關鍵決策網》，衛生福利部官方網站。
- 蒙志成，2016，〈越融合或越疏離？解析當前兩岸交流下台灣民眾身分認同的內涵與影響〉，《台灣政治學刊》，20(2)：187-262。
- 聯合新聞網，2020，《新冠肺炎病毒是被製造的生化武器？權威醫學期刊解答》。
- 劉紹華，2020，《肺炎疫情下談疾病的命名與汙名》，記疫。
- 蘋果新聞網，2020，《駁病毒是生化武器 中國外交部跳腳：言論〈居心不良〉》。

關弘昌，2018，〈臺灣青年世代統獨與兩岸經貿交流態度之探索〉，《遠景基金會季刊》，19(2)：1-40。

TVBS 民意調查中心，2020a，《蔡英文總統滿意度與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民調》。

TVBS 民意調查中心，2020b，《蔡英文總統連任就職滿意度民調》。

TVBS 民意調查中心，2020c，《選後一個月，蔡英文總統滿意度與武漢肺炎疫情民調》。

## 二、英文部分

Abalakina-Paap, M., W. G. Stephan, T. Craig, & W. L. Gregory. 1999. "Beliefs in Conspirac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1999, 20(3) 637–47.

Alfano, M. ... D. Lapsley. 2017.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Intellectual Humility." *PLoS ONE* 2017, 12(8) e0182950.

Baron, J., & J. T. Jost. 2019. "False Equivalence: Are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qually Biased?"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9, 14(2) 292–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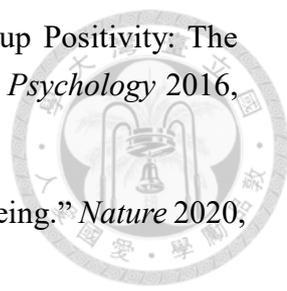
Bavel, J. J. V. ... R. Willer. 2020. "Using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 to Support COVID-19 Pandemic Response."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0, 4(5) 460–71.

Biddlestone, M., R. Green, & K. M. Douglas. 2020. "Cultural Orientation, Power,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Intentions to Reduce the Spread of COVID-19."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20, 59(3) 663–73.

Branscombe, N. R., M. T. Schmitt, & R. D. Harvey. 1999. "Perceiving Pervasive Discrimination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Implications for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77(1) 135–49.

Branscombe, N. R., & D. L. Wann. 1994. "Collective Self-Esteem Consequences of Outgroup Derogation When a Valued Social Identity Is on Trial."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4, 24(6) 641–57.

Byford, J. 2011.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onspiracy Theories." In *Conspiracy Theor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ed. Jovan Byfor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37.

- 
- Cichocka, A. 2016. “Understanding Defensive and Secure In-Group Positivity: The Role of Collective Narcissism.”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6, 27(1) 283–317.
- Cichocka, A. 2020. “To Counter Conspiracy Theories, Boost Well-Being.” *Nature* 2020, 587 177.
- Cichocka, A., & A. Cislak. 2020. “Nationalism as Collective Narcissism.”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2020, 34 69–74.
- Cichocka, A., M. Marchlewska, A. Golec de Zavala, & M. Olechowski. 2016. “‘They Will Not Control Us’: Ingroup Positivity and Belief in Intergroup Conspi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6, 107(3) 556–76.
- Cichocka, A., M. Marchlewska, & A. G. de Zavala. 2016. “Does Self-Love or Self-Hate Predict Conspiracy Beliefs? Narcissism, Self-Esteem, and the Endorsement of Conspiracy Theor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016, 7(2) 157–66.
- Cichocka, A. ... M. Olechowski. 2018. “Personal Control Decreases Narcissistic but Increases Non-Narcissistic in-Group Positiv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18, 86(3) 465–80.
- Cislak, A., M. Pyrczak, A. Mikiewicz, & A. Cichocka. 2020. “Brexit and Polexit: Collective Narcissism Is Associated With Support for Leaving the European Un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20, 15(1) 1–21.
- Claassen, R., & M. Ensley. 2016. “Motivated Reasoning and Yard-Sign-Stealing Partisans: Mine Is a Likable Rogue, Yours Is a Degenerate Criminal.” *Political Behavior* 2016, 38(2) 317–35.
- Craft, S., S. Ashley, & A. Maksl. 2017. “News Media Literacy and Conspiracy Theory Endorsement.”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2017, 2(4) 388–401.
- Crocker, J., R. Luhtanen, S. Broadnax, & B. E. Blaine. 1999. “Belief in US Government Conspiracies against Blacks among Black and White College Students: Powerlessness or System Blam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9, 25(8) 941–53.
- Crocker, Jennifer, & L. E. Park. 2004. “The Costly Pursuit of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4, 130(3) 392–414.

- Dieguez, S., P. Wagner-Egger, & N. Gauvrit. 2015. “Nothing Happens by Accident, or Does It? A Low Prior for Randomness Does Not Explain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5, 26(11) 1762–70.
- Douglas, K. M. 2021. “COVID-19 Conspiracy Theorie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021, 24(2) 270–75.
- Douglas, K. M. ... F. Deravi. 2019. “Understan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2019, 40(S1) 3–35.
- Douglas, K. M. ... A. J. Harvey. 2016. “Someone Is Pulling the Strings: Hypersensitive Agency Detection and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Thinking & Reasoning* 2016, 22(1) 57–77.
- Douglas, K. M., R. M. Sutton, & A. Cichocka. 2017. “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7, 26(6) 538–42.
- Duran, N. D., S. P. Nicholson, & R. Dale. 2017. “The Hidden Appeal and Aversion to Political Conspiracies as Revealed in the Response Dynamics of Partisa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7, 73 268–78.
- Dyduch-Hazar, K., B. Mrozinski, & A. Golec de Zavala. 2019.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n-Group Satisfaction Predict Opposite Attitudes Toward Refugees via Attribution of Hostil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 0.
- Ellis, E. G. 2020.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s a Petri Dish for Conspiracy Theories.” *Wired* 2020,.
- Emmons, R. A. 1984. “Factor Analysis and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4, 48(3) 291.
- Emmons, R. A.. 1987. “Narcissism: Theory and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 52(1) 11–17.
- Enders, A. M., J. E. Uscinski, C. Klofstad, & J. Stoler. 2020. “The Different Forms of COVID-19 Misinformation and Their Consequences.” *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isinformation Review* 2020,.
- Federico, C., A. Golec, & W. Bu. 2021. “Collective Narcissism as a Basis for Nationalism.” 2021,.
- Federico, C. M., & A. G. Golec de Zavala. 2018.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Vot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18, 82(1) 110–21.

Fenster, M. 1999. *Conspiracy Theories: Secrecy and Power in American Culture*. U of Minnesota Press.

Frankovic, K. 2020. “A Growing Number of Americans Want Stronger Action against Coronavirus—and Conspiracies Are Abound | YouGov.” *YouGovAmerica* 2020,.

Freeman, D. ... S. Lambe. 2020. “Coronavirus Conspiracy Beliefs, Mistrust, and Compliance with Government Guidelines in England.”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20, 1–13.

Galliford, N., & A. Furnham. 2017. “Individual Difference Factors and Beliefs in Medical and Political Conspiracy Theorie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7, 58(5) 422–28.

Golec de Zavala, A. 2018.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Exaggeration of the In-Group Image.” In *Handbook of Trait Narcissism*, eds. Anthony D. Hermann, Amy B. Brunell, and Joshua D. Foster.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79–88.

Golec de Zavala, A. ... T. Baran. 2020. “Low Self-Esteem Predicts out-Group Derogation via Collective Narcissism, but This Relationship Is Obscured by in-Group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20, 119(3) 741–64.

Golec de Zavala, A., & A. Cichocka. 2012.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Anti-Semitism in Poland.”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012, 15(2) 213–29.

Golec de Zavala, A., A. Cichocka, R. Eidelson, & N. Jayawickreme. 2009.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9, 97(6) 1074–96.

Golec de Zavala, A., A. Cichocka, & I. Iskra-Golec. 2013. “Collective Narcissism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In-Group Image Threat on Intergroup Host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3, 104(6) 1019–39.

Golec de Zavala, A., K. Dyduch-Hazar, & D. Lantos. 2019. “Collective Narcissism: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Investing Self-Worth in the Ingroup’s Image.” *Political Psychology* 2019, 40(S1) 37–74.

Golec de Zavala, A., & C. M. Federico. 2018.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the Growth

of Conspiracy Thinking over the Course of the 2016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8, 48(7) 1011–18.

Golec de Zavala, A. G., A. Cichocka, R. Eidelson, & N. Jayawickreme. 2009.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9, 97(6) 1074–96.

Golec de Zavala, A. G. de. 2011.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ntergroup Hostility: The Dark Side of ‘In-Group Love.’”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11, 5(6) 309–20.

Golec de Zavala, A. G. de, A. Cichocka, & M. Bilewicz. 2013. “The Paradox of In-Group Love: Differentiating Collective Narcissism Advance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Group and Out-Group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13, 81(1) 16–28.

Golec de Zavala, A., & D. Lantos. 2020.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The Bad and the Ugl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0, 29(3) 273–78.

Golec de Zavala, A., M. Peker, R. Guerra, & T. Baran. 2016. “Collective Narcissism Predicts Hypersensitivity to In-Group Insult and Direct and Indirect Retaliatory Intergroup Host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16, 30(6) 532–51.

Green, R., & K. M. Douglas. 2018. “Anxious Attachment and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8, 125 30–37.

Grzesiak-Feldman, M. 2013. “The Effect of High-Anxiety Situations on Conspiracy Thinking.” *Current Psychology* 2013, 32(1) 100–118.

Guerra, R. ... C. Sedikides. 2020. “An Intergroup Approach to Collective Narcissism: Intergroup Threats and Hostility in Four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020, 136843022097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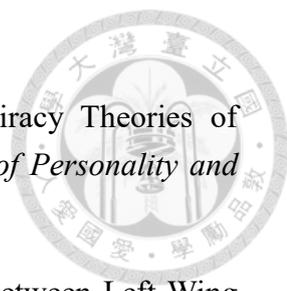
Hainmueller, J., Mummolo, J., & Xu, Y. (2019).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Estimates from Multiplicative Interaction Models? Simple Tools to Improve Empirical Practice. *Political Analysis*, 27(2), 163-192.

Hazlett, A. 2012. “Higher-Order Epistemic Attitudes and Intellectual Humility.” *Episteme* 2012, 9(3) 205–23.

-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Inc.
- Hogg, R. ... C. Miller. 2017. "Conspiracy Beliefs and Knowledge about HIV Origins among Adolescents in Soweto, South Africa." *PLOS ONE* 2017, 12(2) e0165087.
- Hornsey, M. J. 2003. "Linking Superiority Bias in the Interpersonal and Intergroup Domain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3, 143(4) 479–91.
- Hughes, S., & L. Machan. 2021. "It's a Conspiracy: Covid-19 Conspiracies Link to Psychopathy, Machiavellianism and Collective Narciss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21, 171 110559.
- Imhoff, R., & P. Lamberty. 2020. "A Bioweapon or a Hoax? The Link Between Distinct Conspiracy Beliefs About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 and Pandemic Behavior."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020, 11(8) 1110–18.
- Jordan, C. H. ... J. Correll. 2003. "Secure and Defensive High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5) 969–78.
- Jost, J. T., & M. R. Banaji. 1994. "The Role of Stereotyping in System-Justif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False Consciousne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4, 33(1) 1–27.
- Jost, J. T., & O. Hunyady. 2002. "The Psycholog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alliative Function of Ideology." In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3*, Hove, England: Psychology Press/Taylor & Francis (UK), 111–53.
- Jost, J. T., A. Ledgerwood, & C. D. Hardin. 2008. "Shared Reality,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Relational Basis of Ideological Belief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08, 2(1) 171–86.
- Keeley, B. L. 1999. "Of Conspiracy Theorie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9, 96(3) 109–26.
- Kernis, M. H. 2003. "Toward a Conceptualization of Optimal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3, 14(1) 1–23.
- Kruglanski, A. W., & D. M. Webster. 1996. "Motivated Closing of the Mind: 'Seizing' and 'Freez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6, 103(2) 263–83.

- Leach, C. W. ... R. Spears. 2008. "Group-Level Self-Definition and Self-Investment: A Hierarchical (Multicomponent) Model of in-Group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8, 95(1) 144–65.
- Leckelt, M. ... M. D. Back. 2018. "Validation of the Narcissistic Admiration and Rivalry Questionnaire Short Scale (NARQ-S) in Convenience and Representative Sample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18, 30(1) 86–96.
- Leman, Patrick J., & M. Cinnirella. 2007. "A Major Event Has a Major Cause: Evidence for the Role of Heuristics in Reasoning about Conspiracy Theor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7, 9(2) 18–28.
- Leman, Patrick John, & M. Cinnirella. 2013. "Beliefs in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the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3, 0.
- LeVine, R. A., & D. T. Campbell. 1972. *Ethnocentrism: Theories of Conflict, Ethnic Attitudes, and Group Behavior*. Oxford, England: John Wiley & Sons.
- Luhtanen, R., & J. Crocker. 1992. "A Collective Self-Esteem Scale: Self-Evaluation of One's Social Ident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2, 18(3) 302–18.
- Lyons, P. A., J. B. Kenworthy, & J. R. Popan. 2010. "In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Group-Level Narcissism as Predictors of U.S. Citizens' Attitudes and Behavior Toward Arab Immigran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0, 36(9) 1267–80.
- Mancosu, M., S. Vassallo, & C. Vezzoni. 2017. "Believing in Conspiracy Theories: Evidence from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Italian Survey Data."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2017, 22(3) 327–44.
- Marchlewska, M., A. Cichocka, O. Panayiotou, ... J. Batayneh. 2018. "Populism as Identity Politics: Perceived In-Group Disadvantage,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Support for Populism."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018, 9(2) 151–62.
- Marchlewska, M. ... M. Bilewicz. 2020. "Superficial Ingroup Love? Collective Narcissism Predicts Ingroup Image Defense, Outgroup Prejudice, and Lower Ingroup Loyal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20, 59(4) 857–75.
- Marchlewska, M., A. Cichocka, & M. Kossowska. 2018. "Addicted to Answers: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and the Endorsement of Conspiracy Belief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8, 48(2) 109–17.

- 
- McCauley, C., & S. Jacques. 1979. “The Popularit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of Presidential Assassination: A Bayesian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9, 37(5) 637–44.
- McClosky, H., & D. Chong. 1985.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eft-Wing and Right-Wing Radical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5, 15(3) 329–63.
- Morf, C. C., & F. Rhodewalt. 2001. “Unraveling the Paradoxes of Narcissism: A Dynamic Self-Regulatory Processing Model.”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1, 12(4) 177–96.
- Moskalenko, S., C. McCauley, & P. Rozin. 2006. “Group Identific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Threat: College Students’ Attachment to Country, Family, Ethnicity, Religion, and University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6, 27(1) 77–97.
- Newheiser, A.-K., M. Farias, & N. Tausch. 2011. “The Functional Nature of Conspiracy Beliefs: Examining the Underpinnings of Belief in the Da Vinci Code Conspirac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1, 51(8) 1007–11.
- Pratt, R. 2003. “Theorizing Conspiracy” eds. Mark Fenster, Timothy Melley, Peter Knight, and Mark Dery. *Theory and Society* 2003, 32(2) 255–71.
- Prooijen, J.-W. van. 2017. “Why Education Predicts Decreased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017, 31(1) 50–58.
- Prooijen, J.-W. van, & M. Acker. 2015. “The Influence of Control on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Conceptual and Applied Extension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015, 29(5) 753–61.
- Prooijen, J.-W. van, K. M. Douglas, & C. D. Inocencio. 2018. “Connecting the Dots: 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 Predicts Belief in Conspiracies and the Supernatural.”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8, 48(3) 320–35.
- Prooijen, J.-W., A. P. M. Krouwel, & T. V. Pollet. 2015. “Political Extremism Predicts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015, 6(5) 570–78.
- Rhodewalt, F., & C. C. Morf. 1995. “Self and Interpersonal Correlates of the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A Review and New Finding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95, 29(1) 1–23.

Roberts, R. C., & W. J. Wood. 2007. *Intellectual Virtues: An Essay in Regulative Epistemology*. Clarendon Press.

Rosenblatt, P. C. 1964. “Origins and Effects of Group Ethnocentrism and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64, 8(2) 131–46.

Roster, C. A., L. Lucianetti, & G. Albaum. 2015. “Exploring Slider vs. Categorical Response Formats in Web-Based Surveys.” *Journal of Research Practice* 2015, 11(1) D1–D1.

Samuelson, P. L. ... J. L. Barrett. 2015.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ectual Virtues and Vices: A Focus on Intellectual Humility.”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15, 10(5) 389–406.

Samuelson, P. L., & I. M. Church. 2015. “When Cognition Turns Vicious: Heuristics and Biases in Light of Virtue Epistemology.”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5, 28(8) 1095–1113.

Saunders, K. L. 2017. “The Impact of Elite Frames and Motivated Reasoning on Beliefs in a Global Warming Conspiracy: The Promise and Limits of Trust.” *Research & Politics* 2017, 4(3) 2053168017717602.

Simmons, W. P., & S. Parsons. 2005. “Beliefs in Conspiracy Theories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A Comparison of Elites and Mass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5, 86(3) 582–98.

Sternisko, A., A. Cichocka, A. Cislak, & J. J. Van Bavel. 2020. “Collective Narcissism Predicts the Belief and Dissemination of Conspiracy Theor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2020,.

Tajfel, H., & J. C. Turner. 2004.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eds. John T. Jost and Jim Sidanius. Psychology Press, 276–93.

Tangney, J. P., R. F. Baumeister, & A. L. Boone. 2004. “High Self-Control Predicts Good Adjustment, Less Pathology, Better Grades, and Interpersonal Suc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4, 72(2) 271–324.

Uscinski, J. E. ... M. Murthi. 2020. “Why Do People Believe COVID-19 Conspiracy

Theorie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isinformation Review* 2020, 1(3).

Uscinski, J. E., & J. M. Parent. 2014. *American Conspiracy Theorie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itriol, J. A., & J. K. Marsh. 2018. “The 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 and Endorsement of Conspiracy Belief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8, 48(7) 955–69.

Whitcomb, D., H. Battaly, J. Baehr, & D. Howard-Snyder. 2017. “Intellectual Humility: Owning Our Limitation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17, 94(3) 509–39.

Whitson, J. A., & A. D. Galinsky. 2008. “Lacking Control Increases 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 *Science* 2008, 322(5898) 115–17.

Yang, W.-Y. 2016. “The China Complex in Taiwan: The Tug of War Between Identity and Interest.” *Issues & Studies* 2016, 52(01) 1650002.

Zavala, A. G. de, & O. Keenan. 2021. “Collective Narcissism as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opulism.” *Journal of Theoretical Social Psychology* 2021, 5(2) 54–64.

Zeigler-Hill, V. 2006. “Discrepancies Between Implicit and Explicit Self-Esteem: Implications for Narcissism and Self-Esteem Insta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6, 74(1) 119–44.

Żemojtel-Piotrowska, M., A. Sawicki, & P. K. Jonason. 2020. “Dark Personality Traits, Political Values, and Prejudice: Testing a Dual Process Model of Prejudice towards Refuge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20, 166 110168.

# 附錄一、四陰謀論完整迴歸分析表

依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				
自變項	(1) 生化武器	(2) 威權政府	(3) 圖利騙局	(4) 經濟崩潰
族群集體自戀	0.24*** (0.05)	0.33*** (0.05)	0.43*** (0.05)	0.44*** (0.05)
<i>控制變項：政治因素</i>				
臺灣人認同	0.52*** (0.05)	0.32*** (0.06)	0.05 (0.06)	0.04 (0.06)
聯合報公信力	0.19 (0.29)	-0.01 (0.32)	-0.25 (0.32)	-0.26 (0.32)
自由時報公信力	0.02 (0.28)	0.34 (0.30)	0.33 (0.30)	0.36 (0.30)
蘋果日報公信力	-0.19 (0.31)	-0.42 (0.34)	-0.02 (0.34)	-0.13 (0.33)
<i>控制變項：社會因素</i>				
家戶收入	0.02 (0.09)	-0.01 (0.10)	-0.10 (0.10)	-0.15 (0.10)
教育程度	-0.26 (0.19)	-0.50** (0.21)	-0.47** (0.21)	-0.51** (0.20)
<i>控制變項：心理認知動機</i>				
開放心態	-0.04 (0.06)	-0.06 (0.07)	-0.03 (0.07)	-0.05 (0.07)
<i>控制變項：心理存續動機</i>				
新冠肺炎風險認知	0.00 (0.00)	0.00 (0.00)	0.01** (0.00)	0.01*** (0.00)
個人控制感	0.06 (0.08)	0.06 (0.09)	0.05 (0.09)	0.07 (0.09)
心理幸福感	-0.00 (0.05)	-0.00 (0.05)	0.06 (0.05)	0.02 (0.05)
<i>控制變項：心理社會動機</i>				
個人自戀	-0.04 (0.06)	-0.01 (0.06)	-0.04 (0.06)	-0.05 (0.06)
<i>其他</i>				
年齡	-0.09 (0.08)	-0.06 (0.09)	-0.06 (0.09)	-0.11 (0.09)
性別	0.30 (0.20)	0.38* (0.22)	0.35 (0.21)	0.22 (0.21)
常數項	0.85	1.47	1.63	2.23*
R <sup>2</sup>	0.154	0.101	0.0986	0.112
觀察值	833	833	833	833

\*\*\* p<0.01, \*\* p<0.05, \* p<0.1, 括弧內為標準誤。

## 附錄二、交互作用項完整迴歸分析表

依變項：新冠肺炎陰謀論				
自變項	(1) 生化武器	(2) 威權政府	(3) 圖利騙局	(4) 經濟崩潰
族群集體自戀 X 台灣人認同	0.06** (-0.02)	0.06** (-0.03)	0.09*** (-0.03)	0.09*** (-0.03)
族群集體自戀	-0.27 (-0.21)	-0.17 (-0.23)	-0.34 (-0.23)	-0.32 (-0.23)
<i>控制變項：政治因素</i>				
台灣人認同	0.22* (-0.13)	0.02 (-0.14)	-0.39*** (-0.14)	-0.4*** (-0.14)
聯合報公信力	0.15 (-0.29)	-0.04 (-0.32)	-0.31 (-0.32)	-0.32 (-0.31)
自由時報公信力	0.01 (-0.28)	0.34 (-0.3)	0.33 (-0.3)	0.35 (-0.29)
蘋果日報公信力	-0.21 (-0.31)	-0.44 (-0.34)	-0.06 (-0.34)	-0.17 (-0.33)
<i>控制變項：心理因素</i>				
家戶收入	0.01 (-0.09)	-0.02 (-0.1)	-0.12 (-0.1)	-0.17* (-0.1)
教育程度	-0.23 (-0.19)	-0.47** (-0.21)	-0.43** (-0.21)	-0.47** (-0.2)
開放心態	-0.05 (-0.07)	-0.06 (-0.07)	-0.03 (-0.07)	-0.05 (-0.07)
新冠肺炎風險認知	0.00 (0)	0.00 (0)	0.01** (0)	0.01*** (0)
個人控制感	0.05 (-0.08)	0.05 (-0.09)	0.04 (-0.09)	0.06 (-0.09)
心理幸福感	0 (-0.05)	0 (-0.05)	0.06 (-0.05)	0.02 (-0.05)
個人自戀	-0.02 (-0.06)	-0.01 (-0.06)	-0.03 (-0.06)	-0.04 (-0.06)
<i>其他</i>				
年齡	-0.09 (-0.08)	-0.06 (-0.09)	-0.07 (-0.09)	-0.12 (-0.09)
性別	0.28 (-0.2)	0.36* (-0.21)	0.32 (-0.21)	0.19 (-0.21)
常數項	3.56** (-1.54)	4.02** (-1.69)	5.51*** (-1.68)	6.06*** (-1.64)
R <sup>2</sup>	0.16	0.1066	0.1112	0.125
觀察值	833	833	833	833

\*\*\* p<0.01, \*\* p<0.05, \* p<0.1, 括弧內為標準誤

## 附錄三、問卷題目一覽表



變項	題目	測量
心理幸福感	請想像現在有一架梯子，總從最低一階 0 到最高階的 10。最高一階代表最好的生活，最低代表最差的生活。請問您個人覺得自己目前處在梯子那一階？	0-10 分
集體自戀	我的族群值得享有特殊待遇	0-10 分
	並不是很多人完全理解我的族群的重要性	
	在我的族群得到應得的肯認前，我永遠不會感到滿意	
個人自戀	我對被搶風頭感到惱怒	0-10 分
	我值得被當成有名望的人物看待	
	我希望我的對手失敗	
	能夠鶴立雞群賦予我很大的力量	
	我努力靠著我的卓越貢獻而得到眾人的矚目	
	多數人在某個意義上都是輸家	
族群認同	我是台灣人	0-10 分
	作為台灣人反映了我之所以為我的一個重要部分	
臺灣報紙公信力	請問以下台灣的中文報紙中，您覺得公信力最高的是	(1)中國時報 (2)聯合報 (3)自由時報 (4)蘋果日報 (5)以上皆無 公信力
新冠肺炎陰謀論	新冠肺炎是科學家所製造的生化武器	0-10 分
	新冠肺炎是意圖永久剝奪公民權利與建立威權政府的一項陰謀	
	新冠肺炎是利益團體為了圖利而設的騙局	
	新冠肺炎是為了掩蓋即將到來的全球經濟崩潰而創造的	

開放心態	我認為關注那些跟我有不同意見的人是浪費時間	 0-10 分
	我不會對向比我博學的人學習感到不好意思	
	如果我對某個主題所知不多，我不介意有人可以教我一些這方面的知識，即便我對其他主題有所涉略	
	即使當我位居高位，我仍願意不恥下問	
	只有弱者會承認他們曾經犯錯	
	我不會認真看待與我不同者	
個人控制感	我很能抵抗誘惑	0-10 分
	我能有效的完成長期目標	
	我難以戒除壞習慣	
	我生性疏懶	
新冠肺炎風險認知	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之前：您認為您感染新冠肺炎的機率有多高？	0%-100%
教育程度	請問您最高的教育程度是？如果您並未在某一級的學校畢業，或正在就讀該級的學校，也請以這一級為您的最高教育程度。（舉例來說，如果您正在大學就讀，請選擇「大學與研究所」）	(1)小學與國中 (2)高中 (3)高職與五專 (4)四技二專 (5)大學與研究所
家庭所得	請問您去年家庭總所得（包括您自己與家人）是多少？請告知稅前的收入，包含紅利與業外收入	(1)0-49 萬元 (2)50-99 萬元 (3)100-149 萬元 (4)150-199 萬元 (5)200-249 萬元 (6)250-299 萬元 (7)300-349 萬元

		(8)350 萬元 或以上
性別	性別：請問您的性別？	(1)男性 (2)女性
年齡	年齡：請問您今年幾歲？	(2)20-29 歲 (3)30-39 歲 (4)40-49 歲 (5)50-59 歲 (6)60-69 歲